



SAIAS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闻道

2017年第2期 总第20期



- 贝文力老师访谈录：从“瓦尔代”研讨会看中俄关系
- 张莹：“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欧盟在中东欧地区的博弈
- 曾大姝：菲律宾对华外交政策的“善变”
——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
- 王乃一：国家的共同记忆——奥马哈美军公墓

靡不有初，寤志有终。

冯绍雷

沟通的渠道

交流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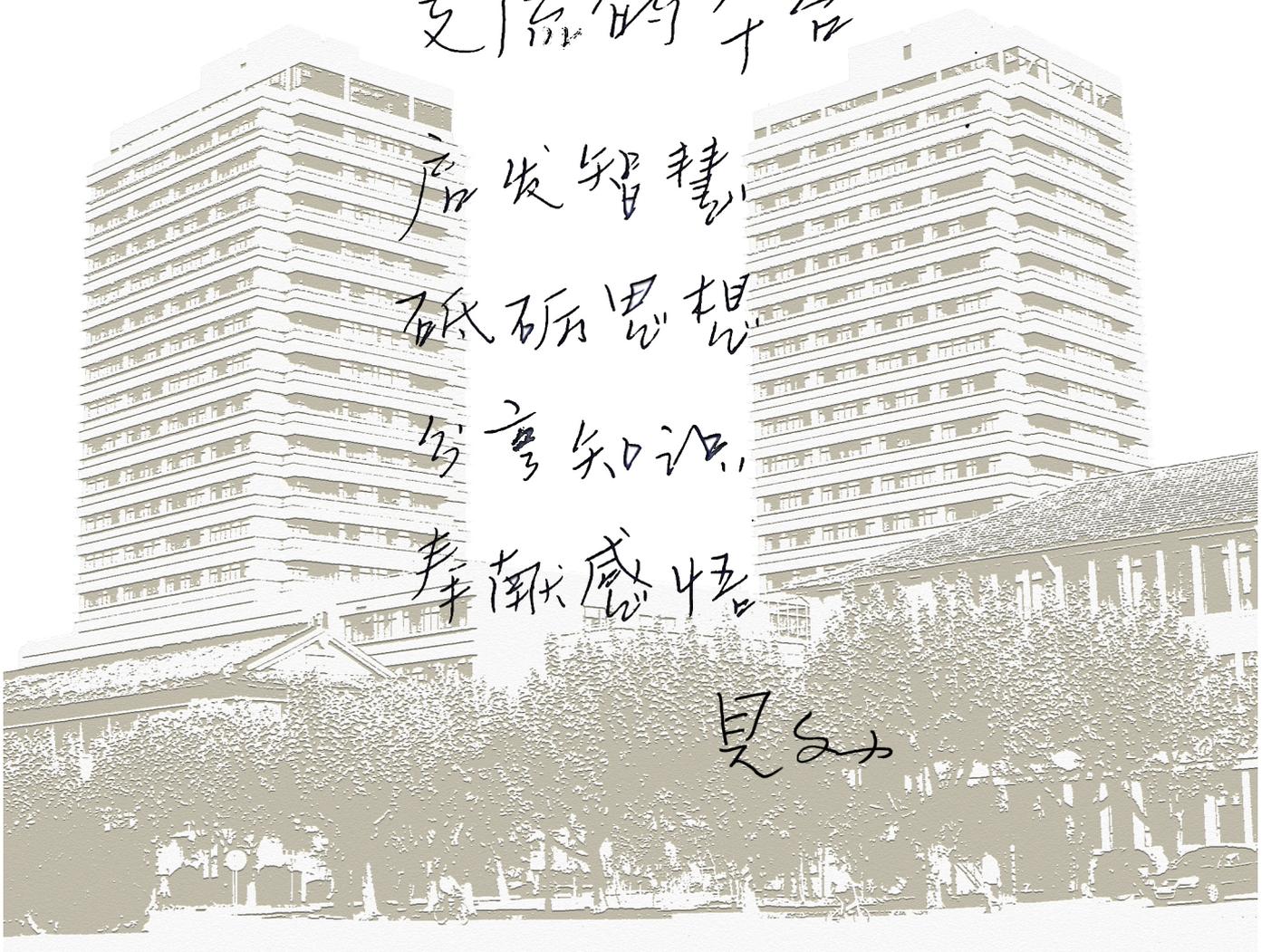
启发智慧

砥砺思想

分享知识

奉献感悟

吴文



个人与历史

张莹

时值端午，粽香满溢。

历史的车轮碾过两千余年，“不数既往，不能知将来；不求远因，不能明近果”。此时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已成为国人的民族自觉。

历史由数以千计的个人创造，个人的命运又被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左右。

远溯陈胜吴广起义，近观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有无数仁人志士，曾怀着屈原的抱负，在满天阴霾时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空。

三纲五常怎可解决华夏病症？章句小楷又怎能抒尽胸中锦绣，宇宙关怀？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代表先后站起来推行救国良方，尽破藩篱，悟彻诸天，破除旧学。而后，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泱泱中华走向自强之路崎岖坎坷。往事被史书铭记，一生功罪交由后人评说。他们塑造历史，也被历史塑造。

不仅是历史名人，普通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尤其是在当前的网络时代。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诸多案件迅速传播，民众对审判结果的不满使得不公正事件曝光天日，这对司法公正大有裨益。英国公投脱欧，个人之力齐聚成江海，对政治决策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历史时代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有好有坏，个人与历史命运间的抗争仿佛永无止境。这一点不仅存在于现实中，在文艺作品中也屡被提及。

在小说《活着》中，每一次转折的背后都是对所处时代背景的讽刺和映射。

电影《甜蜜蜜》里，无论是黎小军还是李翘，都是那个基调灰暗的时代的缩影，个人的奋斗在时代的浪潮里显得不堪一击：内地人在香港的漂泊闯荡，华人在美国生活的艰辛。他们积极上进，却饱受命运和时代的捉弄。即便成功了最后往往也是遍体鳞伤。

可所幸的是，他们最终重聚。

直到满城都回响起邓丽君的《甜蜜蜜》，直到唱歌的人已经不在。

普通人活得朴素无声，可是却也都有时代的光彩与烙印。

不管愿意与否，我们都身处于当今这个时代，你我也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生在世，沧海一粟，蜉蝣一生，愿你我都能在这洪大的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闻道

2017年第2期
总第20期

主 编：
陈子越

本期执行主编：
张 莹

副主编：
刘一鸣 孙 莹
夏真真

编 辑：
(按拼音字母排序)
陈 征 康 恺 连鹏飞
陆依宁 沈钦韩 岳叶帆
张 颂 赵中野 周婷婷

封面题字：
冯绍雷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目 录

卷首语

个人与历史
..... 张莹

学人访谈

贝文力老师访谈录：从“瓦尔代”研讨会看中俄关系
..... (01)

学术之光

欧盟难民问题研究：基于治理和法律的视角
.....王德恒 (16)
“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欧盟在中东欧地区的博弈
..... 张 莹 (29)
中国周边外交政策下“主动性外交”的理论分析
——以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为例
.....肖妙文 (38)
菲律宾对华外交政策的“善变”——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
..... 曾大姝 (47)

海外游学观察

法国游记
..... 李冰岩 (59)

国家的共同记忆——奥巴马美军公墓
.....王乃一 (63)

感受俄罗斯
.....朱信荣 (70)

记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谈判和对美国的印象
.....冉 聘 (73)

国关要闻
..... (77)

《闻道》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该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闻道》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本刊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 座 414 室

邮编: 200062

邮箱: wendao_ecnu@sina.com

网站: <http://www.saia.ecnu.edu.cn/il265.htm>

注: 未获本刊事先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学人访谈

贝文力老师访谈录

从“瓦尔代”研讨会看中俄关系

学人小传

贝文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党总支书记、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会理事。俄罗斯普希金国立俄语大学访问学者。2005年至2009年在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化艺术。主持两项国家开发银行委托研究项目，参与三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出版专著《大剧院的故事》、《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化艺术》，译著《彼得堡的冬天》、《莫斯科佬》，教材《俄语高级口译技能训练与实战演练教程》。担任《普京文集（2012-2014）》编委并参与翻译。翻译《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列宾》、《拉赫玛尼诺夫》等俄罗斯文艺传记片。发表论文“经典文学与俄罗斯芭蕾”、“俄国社会文化图景上决斗影像的描绘”、“双城记——莫斯科和彼得堡”、“镜头后的风云”等。参加在北京、莫斯科、明斯克、基辅等地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闻道》：非常感谢贝老师接受《闻道》的采访。今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联合举办了第四届

“瓦尔代”中俄关系研讨会，今年会议的主要议题和关注点是什么？

贝：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与《闻道》编辑部的朋友们交流。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2004 年由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俄罗斯新闻社、《莫斯科时报》等机构发起组织，每年召开会议，研讨相关问题，是世界各国研究俄罗斯和国际问题专家们的专业聚会。会议期间，参与者有机会与俄罗斯高层官员和学者交流，参观访问一些重要部门和地区。其中，与俄罗斯总统会面是会议最受外界关注的内容。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是研究俄罗斯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学术平台，也是国际学界了解俄罗斯最新政治走向、俄罗斯精英阶层决策思想的独特窗口。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还与有关国家的研究机构联合举办分组会。中俄分组会到今年已经举办了四次，四次会议都是瓦尔代俱乐部与我们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这也体现了我们中心的学术实力、影响力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评价程度。

今年研讨会所确定的主题是“中国与俄罗斯：应对全球变化的挑战”，下设六个分议题：（1）中俄面临的总体国际政治经济环境；（2）中俄美三边关系发展前景；（3）网络安全与网络空间；（4）中俄共同邻国的动态发展；（5）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及其对中俄的影响；（6）中俄经贸合作现状与前景。议题围绕中俄关系，又不限于两国关系。

会议采取“闭门”形式，没有第三方参加。中俄双方畅所欲言，深入交换真实的想法，碰撞思想的火花。每个分议题一般有 30-40 分钟的发言时间，每位学者用 8 到 10 分钟的时间阐述自己的观点。首先要对讨论的题目有整体的把握，提出问题，进而对问题进行剖析，提出对策和建议。今年参会的中方专家学者共 18 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有政府部门的，例如商务部的同志；也有重要企业的，如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企业代表不仅有来自北京的，也有驻莫斯科工作的同志。这也体现出了本次会议考虑安排上的全面性：既有学术理论，又有具体实践，也结合了国内国外不同的工作情况。

会议非常务实。梳理、讨论和分析了两国在合作中做了些什么，取得了哪些成就，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如何应对解决等等。既有理论上的阐述，又有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提出的建议也具体务实。每位学者发言之后都有讨论互动环节。这也是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带领我们在筹备设计此次会议的时候一直孜孜以求的：希望会议的成果能够有助于实实在在地推进两

国的合作与发展。

另外，这次会议除了专家学者的会场讨论，场外的互动也很活跃。俄方还安排了与两位部长的会面，一位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一位是远东发展部部长。两位部长都很年轻，体现出俄罗斯领导层的年轻化。他们对自己主管领域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涉及各种统计数据时，都是脱口而出。对于中俄合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两位部长也有相当全面的了解和具体的设想。

《问道》：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会议在议题设置上哪些变化？

贝：今年会议中的六个分议题，有五个议题在以前的中俄分组会上都有过涉及，网络空间与网络安全是新议题。因此会议主持人在致辞的时候，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主任、俄外交与国防委员会荣誉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展与支持基金会学术主任）在发言时，都强调了这一点，可见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重视。就这个议题发言的，俄方有两位专家：一位是专门从事网络研究的政治研究中心的顾问，一位是莫斯科国立大学信息安全研究所的副所长。中方有两人发言，一位是复旦大学的沈逸老师，沈老师是研究网络安全问题的专家；另一个是我。

《问道》：在这个议题下，您认为俄方最关注的是什么？

贝：俄方十分关注中方对于网络空间与网络安全问题的看法，在实践中是怎么做的，做了些什么。

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全面影响我们生活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全球的经济、利益、安全格局。网络关系已经成为今天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给国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关系带来越来越直接和明显的影响。

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生活的新空间。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现。网络空间时常阴云密布，网络战此起彼伏。一些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干涉别国内政，从事大规模网络监听，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等成为全球公害。

网络空间安全，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扫除网络空间的阴云雾霾，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这需要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共同

治理。

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优先议题之一，在全球治理议程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各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和公民个人，也积极参与治理机制的构建，参与到互联网治理、数据治理、行为规范治理等不同层级的治理领域的机制构建中。

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行为规范治理的机制建立尤为复杂。

现实社会中，国家之间的行为规范建立在主权基础上。网络空间建立行为规范，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各方还没有对网络空间中的主权达成统一的认识。同时，网络自由主义、网络公域等概念都试图解构网络主权。

随着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进程的推进，各方这样一个意识正在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的建立需要以主权作为基本准绳。

多边参与、多方参与的进程也在推进。2016年9月，美国交出了对互联网监管的权限。尽管是程序和形式上的，但还是为实现多边、多方的参与提供了空间，尽管目前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狭小的。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各国开展竞争、博弈的新领域。

由于互联网互联互通，构成了人类“共同的家园”，因此，在竞争、博弈的同时，合作、共治正在成为治理和构建新秩序的重要途径。

中国和俄罗斯不时受到来自其他网络大国的批评和指责。同时，中美、俄美都有相关的网络合作协议，彼此间都进行沟通、协商，这既能维护各自相关的合法权益，保证网络安全，也能促进网络空间行为的规范化。

大国间的合作能够构成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基石。大国之间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寻找到最大公约数，实现打击网络犯罪、实施反恐、保护个人信息、防范金融诈骗、打击儿童色情信息传播等目标，并且起到示范效应。

中俄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框架内积极合作，形成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等重要共识，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合理方向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2016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

中俄网络关系快速发展，双方在网络空间政策、技术、商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全方位推进。中俄跨境电商成为双方经贸合作的亮点。两国应

继续加深合作：一是在网络政策方面，在遭遇网络挤压的时候，加强协调协作；二是推进网络共享共治，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三是维护网络安全，推动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四是加快网络互联互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信息壁垒，缩小数字鸿沟，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五是繁荣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立中俄合作示范项目，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六是加强人文交流，增信释疑，增进相互了解，达到“民心相通”。



《闻道》：是怎样的经历和际遇使您开始专注于从事俄罗斯文化的研究？

贝：我从小学时期就开始学习俄语。那些年在上海教俄语的小学很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当时在安排学校开设外语课程时，有一种说法，叫做“要两条腿走路”，也就是说既要有英语教学，又要有俄语教学。我所在的那所小学正好开设俄语，从此我就与俄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语言学习是很肤浅的，而且学习的材料在语言上也不纯粹，很中式，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就这样，我在初中、高中一直学俄语。然而到了高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开始实施改革开放，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建设发展经验，英语也由此更受重视，学俄语的人逐渐减少，原来学俄语的，很多转学了英语。记得每次上外语课，我们班就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同学学英语，我们六个人到另一个教室学俄语。在当时，整个社会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学习外语的兴趣和热情都很高。

闻道

那时候，书店常有外国经典名著的原文简写本。我买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俄罗斯文学大师的名作简写本来看。能看懂一些，就很兴奋，很受鼓舞，学习兴趣也就更大。后来，《苏联文学》杂志创刊出版，就是现在《俄罗斯文艺》的前身。这本杂志为我打开了一扇朝向俄罗斯文学的窗户。我至今都记得期盼新一期出版的那种感觉。我特意没有采取订阅的形式，而是算着时间，每期出版时都去淮海路思南路口的邮局购买。考大学的时候，我报考了华东师大俄语系。越学习，越钻研，对俄语、俄罗斯文化的兴趣越浓烈。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博大精深，令人流连忘返。毕业后，我就留校做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教师，逐渐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前辈学者一直给予我无比宝贵的指导和帮助。在俄罗斯普希金国立俄语大学的学习，进一步加强了学术训练，开拓了学术视野。让我一直感到很自豪的是，在当时，这所学校是全俄唯一一座以普希金名字命名的大学。

《闻道》：后来您是怎样从学校转调到使馆工作的？

当时，教育部在选派驻外人员，学校推荐了我。经过严格的遴选、培训、实习，2005年，我被派往驻白俄罗斯使馆负责教育处的工作。中白两国教育部之间各项事务的沟通、两国院校的交流合作、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推广、教师学生的互换、两千名在白中国留学生权益的保障等等，都是教育处的工作范围。工作的面广、量大。而教育处就我一个人。所以说，这一工作很光荣——作为教育外交官，代表着国家，很重要，也很锻炼人。

驻白期间，正值两国关系蓬勃发展，两国教育领域开始全面、深入合作的进程。我有幸在大使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每天的日程总是安排得很满。事无巨细，尽量周到。

随着两国教育合作的深入，中国每学年都会有公派教师、志愿者和交换生来白俄罗斯。他们抵达明斯克的时候，我一般都到火车站去迎接。他们通常是经莫斯科坐火车到明斯克的。驻俄罗斯使馆教育处的同志事先会通知我，告知那些老师、同学们乘坐火车的班次、车厢等。经过长途跋涉，他们抵达后走出车厢，看到我国使馆的同志在迎接，都感到很亲切。我还事先准备好有使馆教育处地址、电话、抵达线路的信息交给他们，有时还有部分生活费，那时是由教育处发的。

“接待日”是教育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接触学生，为他们提供服务、排忧解难的重要机会。当时是安排每周两个半天作为“接待日”，

每次都有不少中国学生来。在白的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自费生。同学们都把使馆教育处当作自己的家，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来。每学年结束的时候，有两百多位留学生毕业，每人都要来使馆教育处开“留学回国人员证明”，那时是人最多的时候。教育处在八楼，记得有一次，队伍从八楼到楼梯一直排队下去，下面的花园里也都是我们的留学生，很壮观。这份证明对学生来讲很重要，当时都是手写的。我们做的时候很仔细，还要核对各种证书、文件。为了照顾有些同学赶回国面试等需要，还要经常加班加点。

除中国留学生之外，白俄罗斯学生也是“接待日”的常客。赴华留学的白俄罗斯学生更是要到教育处来办理各项手续。中白关系特别好，中国文化对白俄罗斯很有吸引力。在“接待日”来教育处的，还有白俄罗斯同学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学汉语的中小学生会来。另外，各行各业，对中国、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都可能会来。我记得，有位年轻的女画家，想创作一幅与东方、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她来过教育处几次，问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历史问题，我尽己所能地向她讲解，还送给她好几本图册。

除了在明斯克的接待日与我国留学生接触外，我们还利用到白俄罗斯各个州参加研讨会、校庆等活动的机会，看望我们的留学生，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白俄罗斯的每个州我们都去过。

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语言文化的推广。比如，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到电台做直播，举办“汉语桥”选拔赛；争取开拓渠道，为白俄罗斯学生争取更多的奖学金名额；组织我国艺术专业的留学生参加白俄罗斯举办的国际艺术节，这些同学中有人会演奏中国的琴、箫、琵琶等民族乐器，还有一位同学会表演“变脸”。艺术节常会有 10 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我们的同学既展示了中国的文化，又通过与各国代表广泛接触交流，拓展了视野，也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明斯克有几所小学开设汉语课，第一堂课请我们去“开讲”，家长也在旁边就坐，还有电视台的记者在一旁拍摄。我讲什么呢？此前大家都说，汉语很神奇，也很难学，所以我想鼓励白俄罗斯的小学生们，激发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增强他们的信心，这对于学习很重要。于是，我先画了一个太阳，由太阳变化成“日”字，再画了个月牙，变化成“月”，“日”加上“月”就是“明”。小朋友们跟着画、写，教室里充满着欢声笑语。我问大家难不难，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难”。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一

闻道

天，有位老太太在“接待日”来到教育处，她说在电视里看到了这件事的报道，觉得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交流很有意义，特意带了自己腌制的黄瓜来慰问和感谢我们。

还有很多与“教育”相关的其他工作，如进行公务性、业务性和礼节性的拜会，参加各种研讨会，协助国内相关院校、研究机构与白方建立交流联系等。

教育外交官的工作经历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收获非常非常多。使我有更强的责任意识，凡事都力求认真、严谨，在考虑和处理问题时，力求全面、客观。

结束在白俄罗斯的任期后，我还是希望回到学校工作，于是调回学校，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

《闻道》：学院最近成立了“白俄罗斯法律信息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或机构？它同学院已有的“白俄罗斯研究中心”在工作方向和内容上是什么关系？

贝：我校白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2010年6月，白俄罗斯教育部第一副部长亚·茹科率白俄罗斯教育代表团访问华东师大，俞立中校长会见了代表团。基于华东师大在苏联与东欧、俄罗斯、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研究方面有数十年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以及与白俄罗斯教育文化界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为增进对白的了解和友谊、加强对白研究、深化完善已有研究的规模和结构，会谈中，提出在华东师大建立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设想。经过讨论和论证，我校于2011年决定成立白俄罗斯研究中心并为此划拨了专门的场地。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心于2012年4月揭牌。这也是我国第一个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得到了白俄罗斯教育部、外交部、文化部、白驻华使馆、白驻沪总领馆和白相关院校的大力支持。中心成立以来，在学术研究、学生培养、人员互访、人文交流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中白双方主管部门的肯定与好评。

2014年陈群校长访问白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教育部签署了共建我校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协议，这使合作进一步机制化、系统化。同时，白俄罗斯教育部下属的所有大学也由此成为我校的合作单位。合作进程非常顺利，合作局面也日益扩大。2015年，中白双方成立了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教

育分委会，华东师大成为中方成员单位，我校领导出席分委会每年召开的会议。

新成立的白俄罗斯法律信息中心，也是双方交流合作日益深入的体现。去年，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代表团来沪访问。在与上海市有关领导会见时，白方提议在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基础之上建立白俄罗斯法律信息中心。

我校对此积极回应。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白俄罗斯法律信息中心于今年3月16日揭幕。在中心能够搜索查阅到几乎所有的白俄罗斯法律信息，一直可上溯到上世纪初，包括苏维埃时期的资料。法律信息中心承担着为相关研究提供全面的信息资料支撑的职能。

《闻道》：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大受欢迎，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然而今天，即便是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俄罗斯文学对我们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是在不断收缩的，您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贝：是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有过很大的影响。从十九世纪末起，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和革命的进程。从清末民初、五四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抗战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到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这段时间跨度有一个世纪，影响深广。很多时候，这种影响还超越了文学本身。

现在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确实不能与当时相比，原因有很多。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我们对外国文化、文学的接受借鉴也越来越多元。现在，我们能接触到更加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学作品，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各种题材，各种风格，能满足多元的需求。另外，在现在的国际格局和情势下，文化影响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速度、经济实力。再次，信息传播与接受的渠道、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但俄罗斯文化、文学依然充满着生命力，依然作为“社会生活的镜子”，以自己的方式，反映时代的变迁，传递民众的心声。事实上，我们国内仍然有很多人希望了解俄罗斯文艺近况。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化艺术》中，我也尝试着对俄罗斯社会转型以来文化艺术的变化发展做了一个梳理介绍。

2013年5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

闻道

签署协议，相互翻译出版对方的 50 本文学作品。2015 年 6 月，在圣彼得堡中俄媒体论坛上，双方商定将翻译出版规模翻倍。这个互译工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译介相对稀缺的情况，既有学术价值，又能使两国民众通过文学作品增加彼此的了解。我们学校出版社是这一工程的中方参与者。我也很荣幸参与其中，翻译了米哈伊尔·波波夫的长篇小说《莫斯科佬》。波波夫是当今俄罗斯文坛上一位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作家，《莫斯科佬》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描写的是俄罗斯当代生活万象。对于我来说，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是进一步感知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也是更全面地了解当代俄罗斯社会生活、民众心态、价值理念的过程。

波波夫是一位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作家。他既写历史，也写当代。他的历史题材作品，总是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感，而他创作的当代题材作品中也总有对历史的回望与追溯，以及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莫斯科佬》以一个疑团重重的情节——某大公司总裁在异地神秘失踪，为切入点，由个人、家庭、企业开始，逐步全景式地展现当代俄罗斯万花筒般斑杂的社会生活，继而引发对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人性、价值、道德、生活意义的思考与评析。《莫斯科佬》讲述的故事在多个地方展开：俄罗斯、乌克兰、塔吉克斯坦；首都、外省；城市、乡村。故事中人物众多，他们的年龄、身份、经历、心态、性格各不相同。故事情节曲折多变。与此相应，作家的叙述方式既自然平实——使人想起俄罗斯经典文学中那些“朴素的”讲故事者，例如“俄罗斯文学之父”亚历山大·普希金——同时又随着事件的进展而变化多端，紧接着第三人称的描述，常常是人物直接的内心独白，意识的流动，“闪回”。在语言方面，叙述者的用语和人物口中的话语，自然生动；而作为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的手段，俗语、俚语、新词或新意得到大量运用。作家还善于通过描述，为读者营造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平面的文字能引发出丰富的通感。对波波夫的创作有很大影响的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经说过，“如果要读懂《安娜·卡列宁娜》，必须能够想象得出 19 世纪中叶一列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火车的样子。”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要读懂《莫斯科佬》，必须能够想象当代俄罗斯的社会风貌、人情世故。翻译这样一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都十分独特丰富的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译者的语言水平、理解能力、文化历史知识的储备、对俄罗斯当今社会生活的了解与熟悉程度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我自知在各方面还远远不够，但接受任务后，尽己所能，

努力翻译好这部小说，力争传递出作品的意蕴。

为了更好地理解原作，我与波波夫先生通信，向他请教。作品中有很多新词、俚语，除俄语外，还有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我就随时向身边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朋友请教，与他们一起探讨。作品中很多地方用词重复，句子结构相似单一，或者说“零散”。最初，我在翻译时会不自觉地做些调整，因为我在学生时代读书作文时，老师要求尽量避免词句——尤其是相邻词句——的重复，已成习惯了。但很快我就不这么做了。在反复研读原作的过程中，我体会到，这也是作者使用的修辞手法，以起到“去精致化”的效果——表现现实的粗糙，生活的忙碌，思想与情感的单调、枯涩。原文中是这样呈现的，我在译文中也应当这样呈现。

去年上海书展举办期间，波波夫先生特地来沪，参加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莫斯科佬》中文版首发仪式。我与他有多次交流，受益良多。后来，我们还在学院里举办《莫斯科佬》推介会暨当代俄罗斯文学研讨会，校内外很多老师同学都来参加了，郑体武等俄苏文学专家在会上作了内容丰富的报告。

《闻道》：您的俄罗斯朋友们是怎样看待他们被许多中国民众称作“战斗民族”的呢？

贝：听到这一说法时，我认识的俄罗斯朋友常常以微笑作答。俄罗斯民族也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具有巨大创造才能的民族。

1988年，苏联画家伊利亚·格拉祖诺夫创作了巨幅油画《苏联各族人民对世界文明与文化的贡献》，并将此赠送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画作全景式地呈现了苏联各族人民，主要是俄罗斯民族，在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电影等几乎所有艺术领域以及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巴甫洛娃、乌兰诺娃、努里耶夫、列维坦、列宾、马列维奇、夏加尔、穆希娜、爱森斯坦、门捷列夫、巴甫洛夫、米丘林、齐奥尔科夫斯基……俄罗斯文化巨人的名单很长很长。

历史上，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独特严酷的气候条件、蒙古鞑靼的征服、游牧民族的威胁骚扰、天然屏障的缺乏等，使俄罗斯民族一直有很强的危机感。为了生存和安全，必须要保持自身强大。俄罗斯的地域辽阔无

闻道

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心胸开阔。同时，寂寥的大自然也容易使个体产生孤独感，引发心理上神秘主义因素的沉积。孤独、渺小的个人感觉使人们重视体验家庭、集体和国家的温暖氛围。传统上村社和东正教的共同性使俄罗斯人强调忘我精神、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抗击来犯之敌时表现出的强大凝聚力。同时，他们也一直有对坚强有力的领导人的追求和崇拜。

民族特性是立体的、多面的，简单地贴以“战斗民族”的标签，容易以偏概全。

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化艺术》中，在回顾自然和民族性格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时，我们曾写道：“漫长、寒冷、昏暗的冬季，使长达数月足不出户的俄罗斯人显得慵懒拖沓，但他们又在狭小封闭的现实空间里任由想象的翅膀翱翔，尽兴拓展想象的空间，这时的俄罗斯人是最富有幻想的。而在冬末渴盼春天降临的俄罗斯人，是最敏感最抒情的。他们会全神贯注、屏息静气地期待和观察，为屋檐上冰雪开始融化后第一滴水珠落地发出的‘滴答’声、树枝上萌发出的第一片新绿、空中掠过的第一只飞鸟欣喜万分，并‘溢于言表’、‘手舞足蹈’地来表现自己的感受。短暂的春天使俄罗斯人变得雷厉风行，而自然景色纯粹的夏天又使他们成为情感最饱满最丰厚的人。金色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举办婚礼和各种狂欢的季节，这时的俄罗斯人是最为奔放激越的，因为随之而来的又将是漫长的冬季。”

《闻道》：您之前提到中俄两国的文化艺术存在共性，这一共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它可以作为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着眼点吗？

贝：俄罗斯横跨欧亚两洲，广袤无垠。处在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乌拉尔山、乌拉尔河是欧亚两洲的分界线。如果把俄罗斯比作一个仰卧的巨人，那他的头和心脏在欧洲，身体大部分都在亚洲。一千多年来，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进行交流，接受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俄罗斯文化是在亚洲和欧洲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发展演进的。20世纪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在自己的著作《俄罗斯思想》里写道：“俄罗斯不能把自己定位东方，从而使自己与西方对立起来；俄罗斯应当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即是东西方；是两个世界的连接者，而不是分割者。”他强调：“世界历史的东方与西方两股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并且处在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巨大的东—西方，俄罗斯把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

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角力。”

因此，俄罗斯文化具有欧亚特征。丰富、多元，具有包容性。

在历史文化传统、精神文化素质、民族情感方式、思维模式等方面，中国和俄罗斯有很多相通相同之处。中俄文化都重视精神、崇尚感性、主张道德完善、富有灵感、注重人情。重视家庭，强调对长辈的尊崇和爱，强调理想信念、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价值观念上，中俄都以群体取向为主。强调谦虚。俄语共有 33 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是 Я，表示“我”。俄罗斯人至今还会以此为例，教育孩子谦虚礼让。

在文化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表达方式、审美理想以及文艺作品在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中俄之间都有很强的共鸣。就我们对俄罗斯文艺作品的接受而言，几乎所有经典的俄苏文学作品都有中译本，普希金、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的创作，更是有中文全集。柴可夫斯基被中国受众亲切地称为“老柴”，在所有外国艺术家中，似乎只有他享有这样崇高而又感人的礼遇。

有共性、共鸣，使得双方易于理解和接受。而这自然也是促进交流与合作的有利条件。

《闻道》：同学们都感叹于您对俄罗斯文化的熟稔，也被您饱满而丰富的艺术文化情感所打动。在文学艺术方面，您对我们青年学生有什么寄语？

贝：我们都知道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拥有怎样的力量 and 作用。艺术来自生活，也高于生活。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我们要把阅读、欣赏文学和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多多地去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我们现在所处的，是高速发展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感受生活的方式和媒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继续变化着。看手机、上网常常代替了人和人之间具体的、因而也是温暖的交流，代替了对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感受。

每年初春，我喜欢放慢脚步，观赏我们的校园。冬天过去了，树木和叶草的黯淡绿色，逐日地在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清丽，越来越充满生机。放眼望去，就像一幅幅画。有时，你会感觉到，那种清纯的、喻示着希望的绿色，是那么的神奇，甚至是难以用画笔再现出来的。周围有很多能够丰富、滋养我们情感和思想的事物，这要我们去观察，想像，咀嚼。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有个戏剧作品叫《三姐妹》。白桦树是“俄罗斯之树”，有

闻道

很丰富的历史文化含义，也是少女的象征。每次走在俄罗斯的白桦林里，我总是想拍一张有两棵白桦树、当中站着一位俄罗斯姑娘的照片，照片的名字就叫“三姐妹”。有一次在乌克兰出差，看到一对新人结婚，旁边还有美丽的伴娘，青春靓丽，朝气蓬勃。这时，正好有一对老人，手挽着手，弓着背，从她们旁边慢慢地走过。看到这组对比，我很感慨，也马上有联想：什么才是最珍贵的？什么才是永恒的？已有的东西我们要怎么去珍惜？

日常生活，大千世界，是那么的丰富多彩。罗丹的那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锻炼”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各种感官，使它们对外界一直充满新鲜感，感受到美。使我们在心灵上、精神上永远保持着充满朝气、生机勃勃。

俄罗斯芭蕾舞大师玛丽娜·谢苗诺娃来沪访问时已经是 81 岁高龄了。她的人生道路、艺术成就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段神话。她是“苏联人民演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她到过世界各地演出，塑造过许许多多经典形象，获得过无数的奖励、鲜花和赞美，被誉为是“上帝创造的芭蕾伶娜”。当时，她作为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艺术指导来访，我有幸陪同她。有件事情令我印象特别深刻。首演开始前，我们在大厅遇到我的一位朋友，她是上海芭蕾舞团的年轻演员。当我介绍她们相互认识时，我的朋友很真诚地对谢苗诺娃说：“全世界年轻的芭蕾舞演员都知道您，崇拜您，热爱您。”谢苗诺娃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脸上露出由衷的微笑，一如少女初次登台获得成功而倍感喜悦幸福那样。我很感慨也很震撼：走过漫长人生道路、经历过人生万千情境的大师，依旧这样敏锐而欣然地感受生活的细节，情态是这样的青春，精神是这样的昂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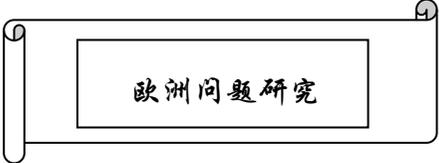
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存在着美的、感人的东西。有一次上课，讨论爱好和收藏的话题，我说起我搜集明信片，结果，有位学生逢年过节以及每到一地出差旅行，都会给我寄一张有特色的明信片，连续 10 多年，一直没有间断。我很感动，也体验到其中的人情、友情的温暖与美好。前几年，有一个同学，在学院走廊里忽然碰见我，脱口而出：“吔，是贝老师！”。“吔”是副语言，本身并不具体表达什么意思，但在这个语境里传递出的情态很自然、生动、亲切。我当时听了，感觉很温暖。我一直记得这个小细节。

再回到文学艺术作品。我们知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音乐、舞蹈等等都是人们思想情感的表达，我们总能从中感受到与我们的思想情感有呼应有共鸣的东西。而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更是凝聚着人们世代追求的真、善、美。多读、多欣赏这样的作品，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更有情趣、更有内涵。



(采访：刘一鸣、孙莹、夏真真、张莹)

(责任编辑：周婷婷、岳叶帆、康恺、连鹏飞、张莹)



欧洲问题研究

【编者按】国际政治的舞台风云变幻，每个时代的国际政治体系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作为行为体的主权国家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所选择的外交路径也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及地域性。国际关系的学科特点要求我们在观察国际政治双边或者多边关系时把握清晰的时代脉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用全面的眼光严谨地审视国际关系。本期《闻道》开辟“欧洲问题研究”与“中国的周边外交研究”专题，聚焦欧洲难民危机，一带一路中各区域之间的博弈，菲律宾对华外交，中国周边外交等热点议题，讨论区域政治动态与外交互动。

欧盟难民问题研究： 基于治理和法律的视角

王德恒*

【摘要】现在学界一般将难民问题视为外交和政治经济问题，但本文认为这种说法在“全球治理”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代逐渐失去了其合理性。相反，本文认为难民问题是一个治理问题，而治理的主要工具是法律。基于这种思考，本文将欧洲难民问题研究转化为一个对欧盟难民法律问题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研究。本文通过分析欧盟基于国际难民法需要对难民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认为欧洲的庇护一体化法律制度是合法的，尽管本文认为这种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进一步地，本文对如何缓解这种不合理进行了分析，并试图预测欧盟可能采取的解决难民问题的途径。最后，本文对难民问题对欧洲的影响做出大胆推论：难民问题本身不会影响欧盟的存续。

【关键词】难民危机；欧盟问题；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

* 王德恒，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本研究在写作时先后得到程金华教授、余南平教授、翁文艳教授和臧术美博士等师友的指点与帮助，并在臧术美博士的课程上得到多位师友的建设性意见，在此一起表示感谢！当然，所有的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世界政治的日程不再由国家间的冲突，而是由一个新议题占据，即国际的潜在的冲突是否能被有效控制住。”——哈贝马斯^①

一、 导论：作为治理问题的“难民问题”

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前述引文中对世界政治议题的评论，暗示了国际关系问题的一种潜在趋势：国际关系的主要议题已经逐渐由国家与国家的冲突让位于国家与国家共同治理地区或全球事务。本文中，笔者借此来思考一个目前最成熟的协商地区治理的共同体——欧盟——面对的一个紧迫的问题：难民问题。

尽管难民问题一直被视为一个外交和政治经济问题。原因在于，难民问题涉及难民来源国和难民接受国的外交关系，且难民接受国在安置难民时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成本和社会风险。然而，尽管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一种事实在社会科学中可以存在多种合理的解释，且这些结束的合理性并不相互排斥。因此，本文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难民问题可以被视为一个治理问题。实际上，在难民问题上，无论是国际层面、地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上都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治理框架。

进一步地，本文认为，难民的产生源于国家间治理能力的差异。例如，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或战争而产生的难民的现象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国家治理自然灾害或应对战争的能力的低下。又如，经济难民和政治难民也往往源于一个国家治理经济和政治事务的能力的低下。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政治难民的产生都是因为这个国家无法在允许这些政治异见者自由表达其观点的同时治理好这个国家，因此只好控制甚至迫害这些政治异见者。

同时，本文认为，难民问题影响难民来源国与难民接受国的外交关系原因也是难民问题提升了难民来源国和（或）难民接受国的治理成本。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的难民（主要是政治难民）如果能够轻易地成为受其他国家保护的难民的话，难民来源国的治理成本将大大提升。例如，假使A国侵害国家安全罪的公民能够顺利向其他国家寻求庇护并成为该国难民的话，那么A国侵害国家安全罪的公民的数量将增加——因为他们无需过分担忧因侵犯国家安全而遭受到A国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A国必须提

^①（德）哈贝马斯：《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伍慧萍、朱苗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页53-54。

升其治理能力——如加强对国家安全相关信息和设施的保护或提高国家安全信息泄露、国家安全设施受损之后的补救能力等——来保证其国家安全，结果必将导致国家治理成本的提升。实际上，韩国将脱北者视为难民的行为极大地挑战了朝鲜的治理能力：朝鲜将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其人口流失。另一方面，难民在另一国的安置需要耗费难民接受国的经济、社会资源，并可能产生潜在的社会问题，加大难民接受国的治理成本。实际上，欧盟难民问题就是一个因接受难民而导致难民接受国与欧盟的治理能力受到挑战的例子。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认为，难民问题是一个治理问题，而治理的主要工具是法律。因此，本文认为，欧盟难民问题研究的实质是研究欧盟层面与欧盟成员国层面与难民相关的法律合理性与合法性。这些法律不仅包括欧盟层面的难民法律，还包括各成员国的劳动法、选举法等。但因为本文的目的是从法律的角度研究难民问题对欧盟前途的影响，本文将重点研究欧盟层面的难民法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二、欧盟难民问题研究的基础：全球性难民法规与申根协定

如哈贝马斯所言，“世界政治的日程中不再主要由国家间的冲突，而是由一个新议题占据^①，即国际的潜在的冲突是否能被有效控制住”，难民问题即为这样一个问题。因此，难民问题的妥善解决必然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框架——如果没有这种全球性难民的处理必将衍生出很多外交争端。减少这种外交争端的数量是建立全球性难民法规的动力之一，且这种动力会随着难民数量的增多而加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国际上的诸多殖民地通过各种形式获得国家地位，并因此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具备了签署国际条约的资格；其中之二是在这一阶段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的难民。因此，《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应运而生。

根据法理学的解释，法律是通过界定权利和义务来达到某种目的。《关

^① 同上注。

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是界定文本签署国与难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两个重要法律文本。因此，这两个法律文本也被视为是难民保护的基石。1984年，国际社会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法律文本提出了界定签署国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不推回原则（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1985年，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签订了《申根协定》。该协定规定，其成员国对短期逗留者颁发统一格式的签证，即申根签证，申请人一旦获得某个国家的签证，便可在签证有效期和停留期内在所有申根成员国内自由旅行。1986年，《单一欧洲法令》签订，目标之一是在1992年前建立一个“确保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内部市场^①。这两个法律文件的签订意味着即将成立的欧盟（成员国覆盖了签订《申根协定》、《单一欧洲法令》的所有签署国）必须在难民问题上采取统一的政策^②。

简言之，由于全球性难民法律法规如《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签订，欧盟的各成员国需要承担接纳难民的责任。而由于《申根协定》、《单一欧洲市场》的签订，难民可以在申根区自由流动，欧盟又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治理因接受难民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三、“都柏林体系”及其合法性与合理性

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对合理性危机（Rationalitätskrise）与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skrise）做了经典的论述。哈贝马斯认为：

“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

^① 参见许洁明、甘开鹏：《欧盟共同难民政策的发展轨迹》，《学海》2010年4月。

^② 黄云松对此作了较系统的研究：申根体系指1985年《申根协定》和1990年《申根公约》，它使部分欧洲国家率先实现了边境自由通行，而同时又具备对第三国（主要指欧洲以外国家）人员流动、特别是难民的监督和控制功能。”参见黄云松：《国际难民法之殇：欧洲共同庇护制度中的“都柏林主义”》，《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合理性危机时一种转嫁的系统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这种危机会转变为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来取消其合法性。相反合法性危机时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ätskrise）。”^①

本文认为，“都柏林体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可以采取这种分析范式，原因在于，当“都柏林体系”的合法性降低时，成员国对欧盟的认同感将降低，进而将导致投入危机，并影响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当“都柏林体系”的合理性降低时，其处理难民问题的能力将降低，并进而影响欧盟将成员国的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之上。

（一）都柏林体系

欧盟成立后，随着欧盟一系列法律文件的签订，如《确认负责审理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者提交的国际保护申请的成员国的标准和程序的公约》（以下简称《都柏林公约》），欧盟建立了独特的难民管理体系——“都柏林体系”。“都柏林体系”涉及的主要法律文本有《都柏林公约》、《避难程序指南》、《收容条件指令》、《难民属性认定指令》以及《欧盟指纹数据库条例》。

“都柏林体系”采取了“第一入境国”原则(The Country of First Arrival)作为非强制的指导原则，即允许难民入境的国家必须负责接收与安置难民并承担后续的费用。这意味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不推回原则在欧盟范围内失效。即欧盟边境的国家将被迫承担处理向欧盟内部的国家申请避难的寻求庇护者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责任。（原因在于寻求庇护者到达难民接受国的主要方式是陆路和水陆，因此那些有意愿向欧盟内部的国家申请成为难民的寻求庇护者大多数将会先到达欧盟的边境的一些国家。）因此，“都柏林体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就非常值得研究。

（二）合法性分析

本文认为，“都柏林体系”涉及的主要法律文本有《都柏林公约》、《避难程序指南》、《收容条件指令》、《难民属性认定指令》以及《欧盟指纹数据库条例》。其中《避难程序指令》、《收容条件指令》和《难民属性认定指

^①（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页53。

令》的主要作用是统一欧盟成员国对难民身份以及难民应该享有的权利的认定，这三个法律文本是所有欧盟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国际层面的法律文本规定的难民身份以及难民应该享有的权利的重新定义。总体而言，这三个法律文本对难民身份的认定要求要低于国际层面的法律文本对难民身份认定要求、这三个法律文本对难民应该享有的权利的界定要高于国际层面的法律文本对难民应该享有的权利的界定，因此这三个法律文本不违背国际层面的法律文本的要求，具有合法性。《欧盟指纹数据库条例》的目的在于便利欧盟各成员国高效地履行本国在“都柏林体系”之下承担的对国际难民的义务，是一个技术性的法律文本^①，因此该法律文本本身不会违背国际层面乃至欧盟各成员国的法律文本的要求，也具有合法性。

与《避难程序指南》、《收容条件指令》、《难民属性认定指令》以及《欧盟指纹数据库条例》相反，《都柏林公约》则对欧盟各成员国需要承担的法律义务及拥有的法律权利重新进行了界定。这种重新界定的表现之一在于用“第一入境国”取代不推回原则成为欧盟难民问题的准则之一——尽管“第一入境国”原则是非强制性原则。

那么，“第一入境国”原则是否会与规定了不推回原则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冲突？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尽管欧盟并非一个国家，但只要欧盟不将向其提出避难申请的难民“推回”至欧盟以外的区域，那么“都柏林体系”是可以被不推回原则允许的。因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承担了其对全球性的难民法律规定的义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第一入境国”原则并不与国际层面的法律文件相冲突^②。

^① 甘开鹏认为“（《欧盟指纹数据库条例》）这项规则不会带来任何的特别风险，仅仅是涉及建立该数据库的费用，而且也不需要授予避难寻求者新的权利和特权。”参见甘开鹏：《〈阿姆斯特丹条约〉与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② 存在不同意见，例如许洁明、甘开鹏认为欧盟的避难体系是违背国际法的：“重新接纳协定无法确保难民得到足够的保护，没有遵从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33条，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3条规定的不遣返原则。”参见许洁明、甘开鹏：《欧盟共同难民政策的发展轨迹》，《学海》2010年4月；又如黄云松认为“‘都柏林主义’是以‘第一入境国’和‘安全第三国’原则为基础，以在欧洲范围内推行难民保护责任的分担为目的，以削减欧盟成员国在国际难民法上的义务为手段，以侵犯和剥夺难民的公约权利为代价来建立欧洲共同庇护制度。”参见黄云松：《国际难民法之殇：欧洲共同庇护制度中的“都柏林主义”》，《四川大学学报》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部分成员国通过签订《申根协定》成立了“申根区”。根据《申根协定》，签署国的公民——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和“企业家”——可以在“申根区”内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必将极大地提升“申根区”的生产效率。由于“申根区”与欧盟的重叠，欧盟的经济也因此而受益。但问题在于“第一入境国”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难民的自由流动，与《申根协定》的主要精神不符，因此对《申根协定》签署国中的欧盟国家来说，《都柏林公约》和《申根协定》这两个文本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冲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合法性冲突”并非一定意味着《都柏林公约》不合法。

简言之，本人认为，“都柏林体系”不存在合法性危机，因此不会直接导致欧盟成员国对欧盟的认同危机。

（三）合理性分析

但即使上述法律文本完全合法，这些法律文本是否合理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作为一个依靠其经济与制度吸引力保证其潜力的国际组织，欧盟的任何制度的合理性都会对其前途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一个低效的制度不仅会直接损害欧盟的制度吸引力，还会通过增加欧盟的治理成本，而这种治理成本的增加甚至可能会导致欧盟的解体。

本文分析的要点之一在于“第一入境国”原则取代不推回原则成为欧盟处理难民问题的指导性原则的合理性。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第一入境国”原则取代不推回原则并不违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难民问题对国际承担的义务。但问题在于，“都柏林体系”加大了欧盟某些成员国的义务，因此，“都柏林体系”是否合理取决于欧盟是否能够让这些成员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这些义务。

本文认为，欧盟难民问题的解决存在三种路径：第一，欧盟的成员国自愿承担“都柏林体系”重新划定的其需要承担的责任；第二，欧盟可以通过经济补偿等手段诱导欧盟的成员国承担“都柏林体系”重新划定的其需要承担的责任；第三，欧盟可以通过强制性手段强迫欧盟的成员国承担“都柏林体系”重新划定的其需要承担的责任。

基于上述阐述，本文重新分析了“都柏林体系”所设立的“第一入境国”原则的合理性。首先，欧盟难民问题的存在本身即意味着欧盟的成员国不愿意主动承担“第一入境国”原则所加诸于其上的责任。其次，欧盟已经设置了难民基金对接纳难民的国家给予经济补偿，然而目前显然这种诱导没

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当然可能是欧盟给予的经济补偿还不够多，但是问题在于欧洲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因此欧盟是否能够给予足以满足难民接受国要求的经济补偿值得考虑。最后，尽管欧盟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并试图通过难民摊牌计划，但此举却遭到了失败。例如，2015年9月欧盟斯特拉斯堡会议通过了难民摊牌计划，但此方案受到了多方指责。^①实际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并无足够的权威来“迫使”成员国无折扣地执行欧盟加诸于其之上的义务。如果欧盟如果强制推行其成员国不愿意执行的一些措施的结果甚至是这些成员国因此脱离欧盟。而且，由于欧盟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面对的一系列问题，欧盟的经济吸引力与制度吸引力正在下降，这意味着欧盟的权威在逐渐消散。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目前，欧盟的“都柏林体系”的合理性存在危机。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都柏林体系”中的“第一入境国”原则是非强制原则，因此，欧盟成员国对“第一入境国”的违背对欧盟权威的损害相对较小（相对于“第一入境国”原则是强制原则的情况）。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经典论述：

“每一次对法律的破坏，哪怕是处于必要，也会损害统治者心中所应有的对国家法律的神圣尊崇，也会为以后的违法行为开创新例，哪怕以后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理由，或者完全没这么紧急，他们也会再度破坏法律。”^②

本文的分析要点之二在于“第一入境国”原则与《申根协定》的核心精神相违背这一现象的合理性。尽管在国际法中存在一定的标准来衡量国际法律文本的合法性，但是一个合法的法律文本可能不是一个合理的法律文本；相反，一个合理的法律文本也可能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律文本。因此，本文未依据国际法的思维方式来看究竟《申根协定》与《都柏林公约》的形式合理性，本文转而从是否有利于欧盟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分析这两个法律文本的实质合理性。

如上文所述，《申根协定》实现了“申根区”内“劳动力”和“企业家”两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了“申根区”的经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欧盟的经济吸引力和制度吸引力。而“第一入境国”原则对欧盟经济和制度的吸引力的正面作用较小。除此之外，即使认定“第一入境国”原则更为合理，那么“第一入境国”原则的实施需要一定的资源和制度——上文提及的

^① 参见丁纯：《欧洲难民潮缘何遭遇“尴尬”》，《热点评述》2015年第27期。

^②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8月第1版，页127。

实施“第一入境国”原则的三种方法要么需要欧盟拥有一定的权威，要么需要欧盟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源。而《申根协定》有利于欧盟权威的提升、经济实力的增强，《都柏林协定》则显然不利于这两者的提升。因此，如果是否有利于欧盟一体化的加深视为分析这些法律文本的合理性的标准，那么无疑“第一入境国”原则的根源《都柏林协定》要相对不合理。实际上，很多分析家指出，欧盟所有的问题的症结都与其经济相关^①。

简言之，本文认为“都柏林体系”存在较严重的合理性危机，因此，在难民问题上，“都柏林体系”难以将欧盟的成员国的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之上。

四、欧盟难民问题的解决

本文在部分将探讨欧盟难民问题的解决。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需要首先引入两个假设：

假设 1：与个人的需求类似，国家、国际组织的需求也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它们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这三种需求得以满足之后才会追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假设 2：与个人相比国家（或者说国家政策的决策者）更关注短期利益。

学理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一个组织建立之后，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会想尽一切办法维系这个组织的存在。这种说法暗示了，当一个组织出现解体的危机时，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维系这个组织的存续，也即视安全需求为比尊重需求更基础的需求。这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1。

笔者试图从实践中证明假设 2。笔者认为，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要远远高于个人之见的关系，因此国家对近期经济利益的偏好程度要远远高于对长期经济利益的偏好。尽管一般认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更能代表其全体国民的利益，但受到任期限制的领导者为了再次赢得选举或在卸任之后

^①比如张健认为欧盟的一切问题都与其经济相关：“欧盟目前的问题和危机，包括社会的激进化、穆斯林融合难、极右势力兴起、恐怖主义威胁增大、难民潮、甚至乌克兰危机等等，都与其经济低迷、缺乏活力密切相关。”参见张健：《欧盟衰落问题辨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2期。又如储殷认为：“欧盟诸国之所以一再普遍表示‘难民过多，容纳不了’，归根结底的原因之一是欧盟经济长期低迷”，参见储殷：《欧洲难民潮：老问题与新危机》，《世界态势》2015年第18期。

拥有被民众认可的“好名声”，也会更加珍视短期利益^①。例如，根据学界流传的比较广泛的观点，德国之所以对采取较为宽容的难民政策的原因除了所谓的“人道主义”之外，还因为难民可以为德国提供所急需的劳动力，在假设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情况下，假设 2 证明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难民问题^②上的转向说明了默克尔为了赢得再选这个短期利益，放弃了为德国补充短缺的劳动力这个长远利益。原因在于德国的劳动法对难民雇佣的规定，即使德国接纳的难民能够为德国补充短缺的劳动力，这个长远利益也无法在德国大选之前转化为默克尔的政绩，相反，德国政府必须在 2017 年之前为接纳这些难民承担高额的成本^③。退一步而言，假若德国政府采取宽容的难民政策的原因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的转向则从实践上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1。

基于以上两个假设，本文对欧盟难民问题的解决方式进行分析。本文在第三部分指出了目前由于欧盟缺乏诱导的“软权力”和强迫的“硬权力”，因此无法诱导或迫使欧盟成员国承担当前欧盟基于“都柏林体系”对各成员国难民责任的重新界定。那么，欧盟实际上还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难民危机。方法 1：欧盟缩减其对国际社会承担的难民义务，即使遭受到道义上的谴责。方法 2：欧盟对其成员国需要承担的难民义务进行重新分配（保护废除“第一入境国”原则这种完全回避难民问题以避免成员国指责其政策合理性的极端选择）。考虑到以上方法可以并用，本文认为欧盟在难民问题上存在以下几种策略组合：

进一步地，本文认为，难民问题是否能够影响欧盟的前途取决于在欧盟无法削减其对难民的义务的情况下又无法通过调整各成员国的义务等方式使成员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这些义务。实际上，即使欧盟无法通过优化各成员国对难民的义务的配置来使得成员国愿意主动或被动承担其作为一

^①正如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在 2007 年谈及经济改革时所言：“We all know what to do, we just don't know how to get re-elected after we've done it.” 尽管 Marco Buti, Alessandro Turrini, Paul Van den Noord, and Pietro Biroli 在其论文 *Defying the 'Juncker Curse': Can Reformist Governments Be Re-elected?* 中反驳了这种观点，但是只要政治家认可容克的这句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做出那些即使客观上有利于但政治家主观上认为不利于他们再次赢得选举的改革。

^② 伍慧萍对德国难民问题的政策做了较系统的分析，参见伍慧萍：《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的应对与政策调整》，《山东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

^③ 郝鲁怡对难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就业权、物质方面的待遇、医疗待遇）做了系统的总结，参见郝鲁怡：《欧盟难民与庇护一体化法律制度研究》，《河北法学》2010 年第 7 期。

个整体对难民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通过逃避国际难民法律规定的欧盟需对难民承担的义务来维系其存续。换言之，存在如下几种情况：

	欧盟承担的难民 责任	欧盟调整难民 政策	成员国的态 度	结果
1	不变	不调整	接受	欧盟存续
2	不变	不调整	不接受	欧盟解体
3	不变	调整	接受	欧盟存续
4	不变	调整	不接受	欧盟解体
5	减小	不调整	接受	欧盟存续
6	减少	不调整	不接受	欧盟解体
7	减小	调整	接受	欧盟存续
8	减小	调整	不接受	欧盟存续

首先，当前的欧盟难民问题的现状说明了情况 1 在现实中的不可能性。实际上，部分学者认为英国脱欧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英国对欧盟难民政策的不满，并进而认为，欧盟如果不改变目前的难民法律，将会导致欧盟的解体。

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这种说法实际上混淆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这两个概念。英国因为对欧盟的包括难民政策在内一揽子政策的不满导致英国脱欧的事实，并不能推论出难民政策将会导致欧盟的解体的结论。

其次，欧盟已经召开了一系列协调会议来重新配置各国需要接纳的难民的额度，但问题在于，目前仍未有能够被成员国接受的办法。实际上，当前几乎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希望减少自己接受的难民的数额。因此情况 3 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此时，情况 4 似乎成为了一种可能的现实。但是，正如本文在假设 1 中所提出的，当欧盟的存续出现危机时，欧盟会更倾向于先牺牲其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也即欧盟将会降低减小其承担的接纳难民的责任来延续欧盟的存续。因此，情况 4 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再次，情况 5 和情况 7 实际上是欧盟目前努力的方向。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欧盟难民问题尚未从情况 5 和情况 7 恶化到情况 6 和情况

8。正如本文在假设 2 中所提出的，当欧盟的存续出现危机时，欧盟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政策维持其存续，情况 7 可以看成欧盟在情况 5 出现时仍不能解决欧盟难民问题时为避免出现情况 6 而采取的行动。

最后，本人认为，情况 8 的出现时难民问题导致欧盟解体的唯一可能情况。而这种情况仅仅是理论性的，正如本文在上文中提到的，当欧盟的存续存在危机时，欧盟甚至会采取废除“第一入境国”原则来避免欧盟的解体——只有欧盟废除这一原则，欧盟的成员国将无法因这一议题质疑欧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欧盟会通过放弃对难民问题的地区治理来维系其存在。

由于目前欧盟没有足够的“软实力”引导有无足够的“硬权力”逼迫欧盟各成员国接受额外的责任，因此欧盟解决难民问题的唯一的途径是减少接纳的难民数量并降低对难民提供的物质帮助。实际上，欧盟已经开始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降低接纳难民的数量、降低对难民权利保证的质量。例如，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设置“安全国家”名单，对于来源于这些国家的难民一律不予接纳。尽管这种一刀切的方式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因为其能够大幅度降低“甄别难民身份”这个程序的成本，因此这种方式从一定程度上将“完全不能解决大多数难民的安置问题”转化成了“不能解决少部分难民问题的安置问题”。如上文所述，降低接纳难民的数量、降低对难民权利保证的质量都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欧盟的道义号召力，损害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但在风雨飘摇之中，保持欧盟的存续才是欧盟最为关切的问题。

与此同时，德国也开始允许如意大利等国家接纳的难民转移到德国，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了“第一入境国”原则。德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难民问题对欧盟权威的损害。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德国对欧盟继续存续下去、欧盟一体化继续深化的愿望，但同时也说明即使采取上述降低接纳难民数量、降低难民享受的的权利的手段之后，在解决难民问题这一议题上，欧盟仍然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危机。

简言之，欧盟难民问题的解决需要欧盟具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或者拥有丰富的补偿性资源。正如在诸多中央集权制的组织中一些不合理的法律、政策能够顺利实施一样（即使这个政权在之后会因为这些不合理的法律、政策崩溃），这个中央权威能够使得欧盟难民问题即使在不符合全体成员国的利益的情况下也能够得到解决。如果欧盟拥有这样的权威的话，那么它无疑会度过这个难关。且因为难民问题也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强制解决也不会导致欧盟的解体。但问题在于，欧盟目前的权威

性不足，而权威的积累需要各个成员国主权的让渡，这种让渡只可能发生在各成员国对欧盟的前景看好的情形下。但显然，目前并非这样的情形。因此，目前欧盟各国采取的削减接受难民的数量和降低对难民权利保证的质量成为了欧盟唯一的选择。

五、总结——兼论难民问题对欧盟前途的影响

本文从法律的角度研究了欧盟难民法律系统的合法性，并从欧盟一体化的前景出发分析了欧盟难民法律系统的合理性。本文的结论之一：尽管欧盟难民法律系统具有相当高的合法性，但是其合理性存在问题。缺乏合理性的问题之一在于由于一体化程度尚不够（缺乏权威）、经济形势不好（缺乏补偿性资源），欧盟无法将“第一入境国”原则贯彻实施。问题之二在于“第一入境国”原则与《申根协定》的核心精神相悖，而《申根协定》是欧盟经济保持高效的制度之一。但这个问题并不会对欧盟的前途命运产生较大的负面效用。原因之一在于“第一入境国”原则并非强者性原则；原因之二在于欧盟各国有修改“第一入境国”原则的意愿和权力，且这一原则的修改也不会对欧盟的一体化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笔者的结论之二：尽管欧盟的难民法律系统的合理性存在问题，但在未来欧盟仍然会作为一个整体处理难民问题——因为人口的自由流动是欧盟保持其经济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世界政治的日程中不再主要由国家间的冲突，而是由一个新议题占据，即国际的潜在的冲突是否能被有效控制住”，对欧盟的未来过于悲观的态度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更能有效控制潜在的冲突。本文的结论之三是：本文认为欧盟存续的威胁来源于在欧盟的“权威”尚不够大之时遭遇经济危机，而难民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只是一个可以用经济解决的问题，同时对于欧洲来说，解决难民问题还有其他的途径，例如采取紧缩的难民政策。因此尽管难民问题确实是欧盟难以解决的问题，但难民政策本身不足以威胁到欧盟的存续。

（责任编辑：康恺）

“一带一路”下中国与欧盟在中东欧地区的博弈

张莹*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政策实施的升温，中国的对外投资近年来也有了显著的增加。本文以“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为时间节点，以中东欧 16 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与欧盟在这一区域投资现状和博弈，进而给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本文认为，中国应该首先正确看待和衡量中东欧在中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将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作为中国-中东欧合作的重心。其次，要重视欧盟的关切，加强同欧盟的沟通，采取恰当的竞争策略，消除欧盟疑虑。最后，中国企业要提高自身实力和竞争力以获得投资红利。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东欧；欧盟；双赢博弈

一、中东欧国家投资环境

从投资环境来看，中东欧国家对外资实行各自的优惠政策。比如，波兰在国内设立了 14 个经济特区，在特区内实行投资优惠政策。捷克不断减少其对制造业投资项目的优惠政策，同时增加对技术中心和商业支持服务等投资项目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匈牙利则重点扶持园区生产性企业，不仅对外国在匈牙利的生产性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还积极倡导其对技术更新和设立区域中心进行投资。塞尔维亚通过提供国家资助的形式，对制造业、服务业和特定部门投资的外国直接投资给以支持。

2013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加强合作，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5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的倡议进入到务实合作的阶段。“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政府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对外投资与经贸合作中，中国政府倾向于选取与中国有着相似政治信仰、政治摩擦较少、国际地位相似、政治关系认同比较高的国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差异巨大，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国家有 1 个，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有 14 个，

*张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有 16 个，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国家有 32 个，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则有 2 个。^① 中国从 2008 年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进入较快增长阶段。不同国家和区域内的不同组织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响应的积极性不同。有学者将中东欧国家的对华认识具体分为三类：包括捷克、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在内的“规范秉持派”，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在内的“温和重商派”以及包括黑山、马其顿等西巴尔干国家在内的“欧盟追随派”。

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

（一）制度规范合作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各方面合作不断加强，制度规范方面的合作逐渐加强。2012 年 9 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在北京正式启动。除此之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订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莱德纲要》。“两个纲要”的实施，使双方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发展态势。通过顶层设计，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紧密联系起来，加强区域内外各方的协同；关注中东欧国家差异性、规避风险；搭建各类平台，实现多方沟通。2016 年 11 月 24 日，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苏州举行，会晤后，中国同中东欧 16 国共同发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使得“16+1”与现有的双边合作与协商机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丰富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的沟通平台。

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已初步建成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官方与民间相补充，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管齐下的交流合作方式。中东欧各国普遍采取任命国家协调员的机制与中方进行协调。中方则专门设立了秘书处，负责协调双方的合作与交流。双方还为不同的合作领域设立了专门的沟通渠道，如中国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针对交通基础设施合作建立了合作联合工作组；中国还定期与中东欧国家举办地方省州长联合会、高级别智库研讨会、青年政治家论坛。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现有的合作机制为双方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中东欧国家国情各异，中国很难在同一框架下与

^①黄群慧主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

各国展开活动。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合作过程中，应充分尊重中东欧国家各自在政治、经济及其他领域的诉求，本着开放、包容和透明的原则，关注各国依据自身特点制定的相关政策，使合作更翔实、更具备可操作性，进而使各方都能成为合作的赢家。

（二）文化合作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相互间的人文交流不断加强，“两个纲要”中，还特别提出了许多深化合作的措施。如向中东欧 16 国提供 5000 个奖学金名额、双方互派学生进行研修，定期举办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及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深化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等 15 项具体措施。从 2012 年起，中国政府每年提供 2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支持双方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然而，双方在制度规范层面的合作效果距离中国的期望仍有不少差距。中国对中东欧的文化影响离还远远不够，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认同程度还有待加强，特别是中东欧国家的年轻人，冷战结束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过西方媒体获得，对华认知片面。

（三）经贸合作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当前过剩的产能需要向外输出。而中东欧大部分国家目前也需要外来投资。双方的经贸合作背景良好。根据近年来中国与各国间进出口额度的比较，可以对这些国家的贸易潜力进行汇总：贸易过度的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贸易不足的国家有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和马其顿等国。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欧盟成员国贸易潜力得到了巨大的发掘，如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家，而非欧盟国家如波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等国家是可以继续挖掘贸易潜力的国家。^①

根据商务部 2016 年进出口总量的数据，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国家是捷克、波兰、匈牙利；从中国进口最多的国家是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随着中东欧国家进一步融入欧盟大市场，加入欧盟的国家对华经贸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尤其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①龙海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及贸易潜力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八国（简称 EU-8）对华贸易关系中出现了比较显著的挤出竞争和转移效应。^①面对欧盟不断扩大的趋势，如何处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关系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尽管部分中东欧国家已经加入欧盟，但是他们与其他发达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巨大，欧盟各国间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存在差异，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政策差异，灵活调整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布局。

三、欧盟在中东欧国家中的影响

冷战后，中东欧国家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入欧盟，密切与美国的关系，向欧洲靠拢。从历史上来看，波兰曾被三次瓜分，捷克在二战中饱经创伤。冷战期间，很多中东欧国家沦为苏联的“卫星国”，中东欧国家成为强国间的角逐场，因此，他们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意识尤为强烈。后冷战时期，中东欧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困扰，如恐怖主义、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潜在的种族、宗教与民族冲突等。这使得他们更加想通过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与机制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在他们看来，加入欧盟，一方面可以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还能获得政治利益，加入欧盟的防务体系，有助于巩固和加强新生的民主制度，防止集权以及极端主义的再度兴起。

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数量扩大至28个。而在之前的2004年5月份，欧盟实现了历史上最大的扩张，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加入欧盟，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从经济上看，加入欧盟，将会极大地促进中东欧国家间经济地整合，推动实现本地区地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完善政策机制，能够让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获得欧盟的“内部援助”，加速实现经济现代化。中东欧入盟后将对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不会影响到中东欧靠近欧盟的大趋势。

（一）文化影响

从文化影响上来看，很多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就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欧洲文化的代表就是天主教与新教，崇尚个人意识与个人权利，崇尚法治与多元社会。因此，东欧剧变之后，中东欧国家想要“回归欧洲”的想法其

^①窦菲菲：《中东欧国家对华贸易：竞争中的挤出和转移效应》，《世界经济与贸易》，2014年第1期。

实也是对欧洲文化持有高度认同的体现。另外，对欧盟的认同很大程度上还与欧盟所能提供的“福利”相关。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以购买力为参照，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明显与欧盟整体发展水平实现了较高的趋同，波兰在入盟时人均 GDP 是欧盟的 51%，2013 年，已接近欧盟平均水平的 68%。其他未入盟的国家无法得到欧盟政策的种种“福利”，因此经济增速有限。捷克总统泽曼表示“我们加入欧盟并不仅是加入大市场，或享受补贴，事实上是加入了大家庭，共享规则，行为习惯以及文化。欧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捷克加入欧盟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给捷克在全球化世界中更好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更好的机遇。”^①

（二）制度影响

从制度影响来看，以中国-中东欧合作为例，欧盟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内的权能已成为约束双方合作的框架。欧盟的权能包括独享权能、分享权能和辅助权能。欧盟的专属权能指欧盟条约赋予联盟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享有专属权能时，只有联盟可在此领域内进行立法和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令，成员国尽在获得联盟授权或为实施联盟法令的情况下才可采取此类行动。^②

通过专属权能的设立，欧盟能够在关税制定、欧元区货币政策、竞争规则的制定等方面影响中东欧国家与第三方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欧盟曾多次以双方合作违反了欧盟相关的规定而反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合作项目，并且要求双方合作要增加透明度。以中波合作中，中国在波兰设立“经济特区”这一事件为例，波兰政府正式因为担心设立“经济特区”会违反欧盟竞争法才反对此提议。中国企业在波兰 A2 公路的修建项目没有取得成功，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建筑材料成本的上升，然而实际上还有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如中国企业面临着欧洲从劳动力到移民标准等一系列立法问题的挑战。

欧盟对中东欧国家软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候选国资格和成员国条件。欧盟对候选国的影响方式虽不能以条约为依据实施制裁，但以成员国资格作为目标，使用软性的政策工具，包括附加条件的积极刺激，规范性

^① Public opinion and national defense, 2014, http://www.kaitseministeerium.ee/files/kmin/nodes/14167_Public_Opinion_and_National_Defence_March2014.

^②金玲，《中东欧国家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欧盟因素分析》，《欧洲研究》，2015年第2期。

压力和劝说等。^①是否遵守欧盟规则和政策是候选国能否入盟的重要考察指标，在这种现实的软性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进行规则转移。

（三）经济影响

欧盟对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欧盟提供的结构基金成为调整本地区经济的重要杠杆；中东欧国家高度依赖于欧盟大市场。为了统合各国间的经济发展，缩小国家间的经济差距，欧盟制定了结构基金体系，其中占份额最大的是地区发展基金，旨在促进落后地区的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集中性原则，伙伴关系原则和附加性原则为新加入的成员国以及经济落后的成员国提供经济支持。

欧洲社会基金关注成员国的就业问题。欧洲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旨在为农村地区新技术的研发，农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支持。渔业基金专为沿海渔业大国而设立等。此外，还有团结基金（Cohesion Fund）、共同农业政策、欧洲投资银行，这些举措加快了这一地区的整合，更加吸引地缘上与欧盟临近的中东欧各国加入欧盟。

波兰是接受结构性基金份额最大的国家。“在波兰，结构性基金显著改善了交通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波兰 GDP 因为结构性资金而额外增长 0.7%。”^②“团结基金使得捷克企业更加具有创新性，并改善了技术产品的发展。”中东欧国家普遍非常看重结构性基金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将其与中国在“16+1”框架下提供的 100 亿信贷相比，认为中国提供的贷款规模小，条件严格，“不好用”，欧盟结构性基金不仅规模大，并且使用条件更加优厚。^③欧盟结构性资金在中东欧国家的发展转型过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欧盟成员国接受的结构基金额（亿元）

国家	2007-2013	占 GDP 百分比	2014-2020
波兰	670	17.2	710
捷克	267	17.6	220
斯洛伐克	117	16.2	140

^①金玲，《中东欧国家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欧盟因素分析》，《欧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②《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三条，参见《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程卫东、李靖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9 页。

匈牙利	240	25.4	219
斯洛文尼亚	42	11.6	33
保加利亚	68.52	16.7	100
罗马尼亚	190	13.4	224
拉脱维亚	45.3	19.4	45.1
立陶宛	67	19.6	68.2
爱沙尼亚	34	18.5	35.8

数据来源：欧盟地区政策网站，<https://cohesiondata.ec.europa.eu/>，2017年1月2日访问。

第二，欧盟是中东欧国家最主要的贸易市场。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债务危机中也受到巨大打击，由此可看出它们对于欧洲市场的高度依赖。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以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参照物，匈牙利，爱沙尼亚、斯洛伐克以及捷克对欧盟的依赖度最高，这些国家的比重都在60%以上。

除了出口，欧盟也是该地最主要的进口来源。本区域内绝大多数国家60%以上的进口都来自于欧盟。进出口的双向依赖，表明了该地区与欧盟大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之深，也表明了欧盟作为大市场对该地区的影响力。^①欧盟还是该地最主要的外资来源。由于双方地理上的临近，文化趋同，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很多西欧发达国家纷纷将产业转移至中东欧国家，流向该地区的资本主要投向实体，例如，德国近年来对V4国家的投资已经形成了一套高效的产业链，扩大了生产能力。

四、欧盟对中国—中东欧合作的主要忧虑

尽管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设立以来，中国在照顾欧盟关切问题上已经做出了不懈努力。“两个纲要”都特别强调中东欧国家是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务实合作有利于加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但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尚不完善，合作平台尚待进一步拓展，惠及各方的合作效果尚待时间检验，要充分化解欧盟的疑虑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①金玲，《中东欧国家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欧盟因素分析》，《欧洲研究》，2015年第2期。

欧盟对于中国的忧虑一方面是担心经济利益的流失，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与欧盟之间存在的互信赤字。欧盟认为中国进入到欧洲地区，中国与中东欧之间合作的加强，合作的机制化、固定化和长期化，会削弱欧盟在此地的话语权，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这将使得对华政策更难达成统一的意见，实施强硬的对华战略。中国加强同中东欧国家的联系将会造成“欧洲分裂”。

此外，欧盟还担心设立的结构性基金会被中国企业窃取利用，失去原本应有的效果。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合作项目的重点中包括了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这与欧盟结构基金的投放重点是重合的。中国曾成功竞标波兰的高速公路项目，这一项目恰巧属于欧盟结构基金的覆盖范围。欧盟担心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这也影响到欧盟与中国在政府采购问题上的谈判。

五、对中国“中东欧外交政策”的建议

中东欧地区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与中国的贸易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由于地缘政治与历史的影响，我国与该地区的联系还有待加强贸易潜力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中国一定要认识到欧盟在中国—中东欧合作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要加强与欧盟的协同，消除与欧盟合作的疑虑，营造互补而非竞争的态势，避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中的政治化。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合作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加强同欧盟委员会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沟通，对于中国企业占优势的产业，我们要争取投资机会与贸易机会。而针对欧盟占绝对优势的产业，我们可以适当地放弃，转而寻找其他的契机。

在与欧盟的沟通中，中国应该清晰地表达出自己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目的，强调务实合作与共赢，避免被误解为服务于对外政策。中国在与欧盟进行协商沟通时，可以借助第三方平台，建立协商机制，让中东欧国家承担中间协调国的角色，就自己感兴趣的产业与欧盟进行政策的协调与沟通。同时，要增加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透明度，减少不必要的阻力。

从竞争性的角度来看，由于要素禀赋不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产品以及目的市场有较大的差异。中国在食品（尤其是大宗粮食贸易）、制成品、机电产品、轻纺品、机械运输和杂项设备上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中东欧国

家在动物油脂、非食用原材料方面能够满足我国的需求。

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的产品结构大致上是互补性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东欧市场的重要潜力，要意识到与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上的竞争性远远小于互补性。要利用双方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有方向地选择贸易产品和投资市场。两者路途遥远，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开展展销会，进行投资和赞助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产品，进军中东欧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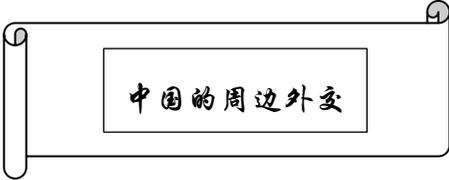
就中国企业自身来讲，中国企业在进入中东欧市场时首先要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习俗与文化传统。效仿欧盟，针对不同的合作对象国制定不同的投资方案。中铁波兰 A2 高速公路项目失败就是一个教训，不仅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还在当地留下烂尾工程，使得中国企业的形象一落千丈。

最后，要慎重考虑本区域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来，中东欧 16 国的安全环境有了新的变化。乌克兰危机发生，北约增强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中东欧的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增加，导致中国原计划投资克里米亚深水港计划也基本夭折。因此，中国企业在进入中东欧市场时要提前做好多套备选方案，减少损失。

六、总结

中东欧地区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环。中国在此地的贸易潜力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然而，在开展中国—中东欧 16 国的合作中，中国遇到了欧盟的掣肘。受到欧盟的排挤和猜忌。欧盟与中东欧 16 国历史上联系密切，文化以及观念上有着高度认同，经济上相互依赖，依存程度高。欧盟忧虑中国将在此地分一杯羹，减少自己的经济收益，更担心中国的介入会破坏整个欧洲的团结，削弱自身的话语权。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在开展与中东欧国家间合作时要重视与欧盟的沟通，强调合作的重心是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避免合作的政治化，避免遭到误解。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应该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和大局观念，积极地走出去，将中东欧地区作为我国加强与欧洲经贸往来的重要部分，同时还学会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减少投资损失。

（责任编辑：康恺）



中国的周边外交

【编者按】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作为一组最基本的国际政治现实，其深刻又直观地反映了行为体之间的外交战略思路以及选择。本期《闻道》开辟专题“中国的周边外交”，提取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外交和菲律宾对华政策的演变两个问题，力求使不同理论范式下的中国周边外交分析能够进行更为广泛的对话，也力图运用不同的研究理论对外交现象提出有用的见解。

中国周边外交政策下“主动性外交”的理论分析——以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为例

肖妙文*

2013年，中国外长王毅在第68届联大会议上表示，中国将更主动和建设性地参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并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014年，通过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创设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成立丝路基金等倡议，中国外交的“主动性”越来越突出。2015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外交政策长大成人”的文章，称中国小心翼翼走入了大国角色^①。中国在坚持周边外交政策下，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却变得更加主动和积极。这种主动性，使得中国在积极开展周边外交的同时，甚至还将外交对象扩展至了美国控制区国家，海合会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如何理解中国这种“主动性外交”呢？

本文将结合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与21世纪初期至今两个阶段的经济交往，从三种国关理论的视角分析中国为何在周边外交的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同海合会国家的“主动性外交”。

*肖妙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① *New York Times*, 参见<https://mobile.nytimes.com/2015/03/27/opinion/chinese-foreign-policy-comes-of-age.html>

一、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的历史与当前状况

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成立于1981年5月,成员国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6国,是海湾地区最重要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海合会国家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29.3%^①(详见表1),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为丰富的区域组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与海合会国家在资源、贸易结构上有着互补关系。近年来,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海合会国家也成为了中国建设贯通中西的“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重点区域。

表 1: 海合会国家 2015 年石油储量 (单位: 亿吨)

国家	2015 年	占世界储量百分比
科威特	140	6%
阿曼	7	0.3%
卡塔尔	27	1.5%
沙特阿拉伯	366	15.7%
阿联酋	130	5.8%
巴林	0.2	-
总计	670.2	29.3%

(一)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期

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以意识形态差异划线,与海合会国家交往为零;海合会国家也将中国划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避犹不及。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双方打破隔膜,开始有了接触。在1971年3月中国与科威特建交、1978年5月与阿曼建交后,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与海合会国家有了进一步的交往。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开始了经贸往来。在中国刚刚肃清国内十年内乱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海合会国家也仅有科威特与阿曼与中国建交,双方间经贸往来有限,形式也比较单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建交,在中国和平共处五

^①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参见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6/bp>

<https://mobile.nytimes.com/2015/03/27/opinion/chinese-foreign-policy-comes-of-age.html-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6-full-report.pdf>

项原则与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方针指导下，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贸往来增多。1989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1991年为15.3亿美元。1995年达33.64亿美元。1996年38.79亿美元。1997年47.71亿美元。1998年为42.47亿美元。2000年达101.23亿美元，比1999年翻了一番^①。在能源合作上，2001年中国从海合会六国共进口原油2036万吨，总额39亿美元，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34%。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交往在稳步发展中。

（二）21世纪初期至今

2004年7月，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签署了《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宣布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这一协议标志着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贸关系日益紧密。根据框架协议，中海双方鼓励各领域内的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经验的交流与合作，清除贸易壁垒，加强企业间合作，扩大贸易自由化途径和手段^②。2004年1月-10月，双方贸易额达19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4%。双方经济互补性很强，在贸易、投资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很大，经贸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③。除此之外，中国与海合会6国均签有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协议。2001年，中国在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项目多达6900个，合同总金额达到150亿美元；到2005年双方的合作项目金额已达302亿美元，5年间增加一倍^④。海合会国家通过石油出口经济累积了丰富的资本，中国在海湾地区进行劳务输出，同时海合会国家也将海湾资金用于对中东、非洲以及中国的海外投资中，这种互动的经济交往促进了中海之间的经贸发展。

在2004年启动自贸区谈判之后，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在12年间进行了三轮谈判，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协定、成立了双边经贸委员会，在货物贸易、关税、知识产权问题上进行了充分讨论。在2016年谈判重启后，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尽管协议的达成还有着多方挑战，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经济外交对于双方来说都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我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关系的建立和发展”，2004年，参见

<http://www.chinaembassy.org.sa/chn/zghgcc/t153264.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参见 <http://chinalaw.net/>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5年，参见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0501/20050100331196.shtml>

^④ “中国和中东国家经贸合作全面发展”，参见

<http://www.china5e.net/news/oil/200612/200612190213.htm>

总体来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交往以经济联系为主（政治军事上联系少，因为海合会国家长期处于美国的控制下），在经济交往上，双方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在能源、劳务合作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经济地位上，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往来是双向的，海合会国家向中国出口能源，中国在海湾地区也有着庞大的工程项目投资，经济地位较为对等。中国和海合会六国之间这种特别的经济外交，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可以从多方面来解读。

一、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

（一）现实主义理论视角

传统现实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些假设，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家被视为理性的行为体，国家利益是分析国家行为的路标，权力是解释国家行为的重要概念。在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中，人性本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冲突的关系，人是自私的行为体，总是为了利益行动。海合会这个区域经济组织就是海合会六国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产物，而这个组织无法起到自助，即不能起到维护六国安全利益的目标时，六国转向美国寻求保护。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中，而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是由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地位来决定^①。因此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土主权，总是要追求权力，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关系，一国的实力越大，相应的权力也就更大，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越大，那么国家利益就越能够被保障。9·11事件后，美国希望在中东地区推行“改造大中东计划”，将美国的民主观念强制移植到海湾地区，海合会国家感到亲近美国不再是一个好举措，为了保障国家利益，海合会六国开始重视与其他西方大国的关系，在东方则是向中国接近。中国这个石油能源的巨大市场，使海合会国家获取了丰富的资本积累，国家实力上升，国家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从海合会国家的角度，与中国的经济外交是基于其国家利益做出的选择。

从传统现实主义的立场，无论是从海合会国家的角度抑或是中国的角度，这种经济外交都是基于双方利益的选择，但在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中，这种对于利益的追求则是次要的，利益与安全相比，安全是首位的。以沃

^①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8页。

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在承认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中）下，强调从体系结构来分析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中央权威缺乏的特点使得国家不能通过更高层次的权威力量来维护自身安全，而是只能通过自助的行为，单方面追求权力来避免潜在危险。而达到安全又有两种方式：通过内部的努力，谋求发展，增强国家自我实力来实现安全；通过对外的努力，自身实力的不够促使国家寻求与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结盟来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实现安全。中国在周边外交的思维指导下，却积极与“遥远”的海合会国家接触：20世纪末期，在中国的开放程度不高时，中国就开始了与海合会国家的接触，而在21世纪初期，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疏远的火星出现之时，中国就积极开展了与海合会国家的自贸区谈判。海湾地区作为美国的控制区，中国的行为未免显得像是在“挖墙脚”：不仅在亚洲积极参与东盟事务，与东南亚国家打好关系，巩固自己的“盟友”，还将手伸到了阿拉伯半岛，“瓦解”美国的盟友圈。在政治上，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政治立场有着较多共同诉求，在地区事务和世界局势问题上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政治上的立场相近，经济上的密切交往，无一不在显示中国拉拢海合会六国的意图。

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利益观还是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中国舍近求远的外交选择是“野心勃勃”的，拉拢盟友，打破美国的包围圈，企图通过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交往，依靠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大力发展经济，一步步增强军事力量，增加自身实力。

（二）建构主义理论视角

在建构主义的观点中，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国际关系的结构不再是权力和制度，而是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影响着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行为，还建构了它们的身份和利益。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不再是物质的而是社会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关系。规范、认同、文化是建构主义的三个核心概念。文化通过建构观念从而塑造个体，形成了国家的多种身份，国家在互动中明确了自己和他者的身份，建立了规范，同时也受到规范的影响与限制，在文化与规范建构下的认同最终建构出了国家利益^①。简而言之，文化构建了身份，身份决定了利益。国家间的互动构建出的共有观念，也会随着国家的互动变化随之产生变化，国家身份利

^①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26页。

益也随之改变。中国由周边外交扩展到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的广泛外交，这种变化正是在互动中观念改变造就的身份改变，随之产生的中国与外国交往的变化。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交往，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但真正有实质进展则到了 20 世纪末期。初期，海合会国家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影响，将中国打入苏联意识形态阵营，中国也由于自身实力的弱小与对外开放程度低，与海合会国家接触少。随着 2004 年提出建立自贸区的计划，交往的增多，双方在互动中改变了对对方的观念，中国在与海合会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交往中明确了自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责任，同时定义了对方的身份。正如建构主义所认为的，观念文化具有自我加强的性质，在与海合会国家的积极交往中，中国给对方乃至世界展现出了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加强，中海双方之间的经济合作一步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社会性的国际体系结构意味着国家间的发展会受到国家身份角色建构出来的共识、规范的影响。对于意图未知的行为体，其他行为体通过“推测”来定义其行为，同时也离不开行为体的“示意”，行为体展现出来的积极正面的行动可以被定义为友好的，而充满挑衅与侵略性的行动就会被归为威胁。1988 年，沙特国王特使阿卜拉·拉赫曼访问中国；1992 年海合会秘书长比沙拉与海合会代表团首次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同年中国贸促会与海合会所属海湾工业咨询组织联合在北京举办中国与海湾国家工业经济合作研讨会，这是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举办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1999 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沙特，会见了海合会秘书长赫杰兰。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在 20 世纪末期的交往增多、来往密切，是双方对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与国际秩序的反应，是各自价值观下的友好行为。

在民族文化上，海合会国家的阿拉伯文明与中国的中华文明同为源远流长的世界文明，沙特与中国的穆斯林团体自从 1949 年中国建国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往来会晤关系；沙特国王阿卜拉谈到海合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时，也直言不讳“沙特需要对外面进行合作，但是我跟中国合作我觉得放心，因为是兄弟，跟中国合作我就觉得心里踏实。”^①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都主张宽容与和平相处，这种文化上的相通之处，加强了如今

^①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访问沙特阿拉伯”，2009 年 2 月 11 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zb_wjdt5.html

中海双方共有观念的构建。中国不仅仅是与海合会国家，中国在进入 21 世纪开始，更加积极的参与亚洲事务，参与全球事务的进程。对非洲难民饥荒的国家给予援助，派遣维和部队积极参与地区反恐事务中去，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构建了追求和平的观念，这种共有观念下的中国身份，是更加积极与无害的，中国承担起了一个大国的责任。中国不仅仅只关心与其密切相关的周边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也以低调、谦逊、诚恳的态度，塑造了值得相信与依赖的大国形象。

（三）新自由主义理论视角

在 20 年代后期，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更加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世界政治经济的多极化导致了全球处在了相互依存中。权利不再是国家对外行为的目标，武力也不再是唯一有效手段，经济技术合作正在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①。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格局不再像以前充满硝烟与冲突，国际形势朝着基本和平的方向发展，军事武力的作用下降，而经济的作用上升。与新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的国家可以通过国际机制的制定来解决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际规则和制度可以实现国家间的合作。新自由主义在承认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命题下，却得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无秩序社会，国际社会也可以是一个无政府的有序社会，无政府并不是国际冲突的必要因素。只有制定国际秩序，才能合理地解决冲突，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国家是自私的行为体所以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才是国际关系的实质。新自由主义强调合作与制度，也正是这种合作与制度催生了经济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下，世界的相互依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强调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下，国家的实质性合作是会存在的，只要制定合理的国际制度来减弱无政府状态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从相互依存的双方关系来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处于一种较为平等的相互依存状态。海合会国家石油资源丰富，石油储量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 1/3，依靠出口石油的单一型经济使得海合会国家并没能成为强国，政治制度落后、社会动荡、军事实力薄弱，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联系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双方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中国对石油能源有着巨大需求，

^①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 月版，第 129 页。

海合会国家也需要中国这个广阔市场来获取投资利益。因此，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外交是一种经济全球化下合作的产物，1996年9月，钱其琛副总理在纽约出席联大期间会晤海合会国家代表和海合会秘书长，双方决定建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定期磋商机制，每年轮流在北京和利雅得举行磋商；2004年框架协议、自贸区谈判；2009年20国集团峰会提出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的为建立机制做出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合作，双方在合作中获取了利益。

二、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的评价与思考

三种不同理论下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外交的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先撇开理论不谈，就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并非海合会国家的合作对象首选，跨越多个时区的合作必然要受到作为海合会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欧盟和长期控制海湾地区的美国乃至俄罗斯、日本等其他大国的挑战。面对这些潜在的挑战，中国反而更为“强势”的参与进海湾事务中。从实际来说，在能源方面，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只会更加紧密，海合会国家成为中国外交的特别关注点也是合理之举；以中国的角度来看，海合会国家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以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也关系到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外交从现实情况的角度来看是充分必要的，而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外交却并不都是必要，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的行为是在挖墙脚，而建构主义却给中国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标签，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双方外交是经济全球化下合作与制度的体现，与前两种理论视角完全不同。每种理论都言之有理，但每种理论却又都无法完全解释清楚，关注的重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中国的外交应该重视这种差异，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观点与立场，以和平友好的态度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

中国的自我认知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分歧。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学者认为中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结构，正如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外交在某些人眼中是：中国在赤裸裸的挑战美国。而在建构主义视角中，中国却不是一个挑战者而是个适应者，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的外交目标，一个挑战者的身份显然是对中国不利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的冲突与碰撞在今后还将有很多，

文化通过建构共有观念塑造了国家身份，中国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地区间的互动使世界接受中国负责任的和平大国形象。除此之外，国家身份也不应是单一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给予了中国开放包容的态度，但也有不应遗忘的民族性格，坚持立场，而不是一味的附和与妥协。

前驻沙特大使郑达庸曾说，阿卜杜拉国王认为，“沙特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也是美国的友好国家，沙特希望中国和美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能够友好，这两个朋友能够发展很好的关系对沙特是有利的。”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外交尽管受到大国因素和国际上地区间形势不确定的影响，但双方积极的态度与充满希望的前景下的合作已经不可逆转，海合会国家只是一个例子，要变成一个“强势的中国”，取决于中国能否处理好“主动性外交”下面临的国际社会的质疑与大国的“挑衅”，中国应该构建一个符合自我认同前提下国际社会认同的“中国模式”，消散“中国威胁论”的阴霾。



（责任编辑：沈钦韩）

菲律宾对华外交政策的“善变”

—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

曾大姝*

【摘要】一国的外交政策是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典型的“中间地带国家”，受制于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的制约，菲律宾的对华政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善变”特征^①。那么，这种“善变”的背后是否有其一致的因果机制？这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既有研究从多重视角、多个问题领域对中菲关系进行解读，但缺乏一种综合的逻辑考量。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统筹考虑体系与单元两个层次的原因，构建了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在单元层面引入“利益偏好”这一核心概念，其包括“自主性—安全—经济”三个内在目标导向。在体系压力之下，一国的外交决策层的利益偏好在这三个目标导向之间进行权衡抉择，进而对外政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关键词】中国；菲律宾；安全；经济；双边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东亚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革新之中。东亚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目光。当前，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松动调整的历史进程之中。地区经济相互依赖、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制度建设等因素有助于维护国家间关系的稳定，使得国家间冲突对抗的代价非常高昂。但是，对地区权力转移的担忧、领土争端等现实利益冲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等因素，则可能加剧相关国家间的对抗和冲突^②。目前，东亚地区主要有四大力量（中国、美国、日本、东盟）展开竞合博弈^③。

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的竞合博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在相关的研究中，小国的外交政策很容易被忽视。在东亚特殊的地缘政治结构背景下，小国恰恰非常重要。纵观东盟各成员国，它们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悬殊、政治体制差异巨大、文化宗教背景不一，但它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夹缝

*曾大姝，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16 级研究生

② 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J]，《当代亚太》，2015(4)，第 25 页。

③ 门洪华：《四大力量博弈与东亚秩序》[J]，《国际政治研究》，2015(5)。

中求生存。周边的中小国家在这样一种互动格局下，呈现出“中间地带国家”的特性。“中间地带国家是指那些在地理上，或在政治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地处在大国夹缝之中的国家或地区。”^①大国的竞争和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中间地带国家”的渗透和争夺而展开的。

从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中国主体大板块与周边国家碎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特征^②，再加上域外大国的介入，使得此区域的国家间互动变得更趋复杂。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域外守成大国加紧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周边国家变成了实现这一遏制目标的桥头堡。在此情形下，对中国来说，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营造和谐稳定的周边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些“中间地带国家”对外行为模式背后的因果机制进行探究。这样一群小国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在大国之间拓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它们的对外行为背后是否有其独特的倾向性和行为模式？这些问题将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将焦点集中于对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是典型的“中间地带国家”，且是具有极强代表性的周边国家之一。其特殊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2、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盟友；3、对华政策表面上呈现出“善变”特点，阿罗约时期中菲关系度过了10年黄金期；然而阿基洛三世时期的中菲关系却急速恶化；2016年新上台的杜特尔特似乎又对华“大抛媚眼”。这种“善变”的背后是否有其内在的同一性呢？本文将构建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菲律宾对华政策“善变”背后的因果逻辑。

二、文献述评

通过搜集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对中菲关系的的研究与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菲律宾国内情况的探讨。陈明华著的《当代菲律宾经济》（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菲律宾的经济情况进行了系统论述。张锡镇的《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论述了菲律宾的国内政治制度。陈乔之主编《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部分论及了菲律宾的对华外交政策。赵江林等著的《奇丽的岛国——菲律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5版），

^① 王鸣野：《中间地带：和谐世界的枢纽》[J]，《东北亚论坛》，2010，（3）。

^② 张文木：《“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1），第26页

主要从菲律宾的自然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外交、社会历史等角度介绍了菲律宾的概况。

第二, 中菲关系的历史回顾性研究。主要著作有: 陈列甫教授的《菲律宾与中菲关系》(南洋研究出版社印行), 主要以华侨为线索, 论述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为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陈列甫教授的另一著作《菲律宾的历中菲关系的过去与现在》, 重点论述了中菲交往的几千年历史。余定邦教授所著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 论证近代西方列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与中国同东南亚的关系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关系。相关学术论文: 暨南大学学位论文—“安全与发展—二战以来中国-菲律宾关系研究”, 该论文从安全与经济的视角论述了二战结束以来中菲关系的历史演变。外交学院学位论文—“关于二十一世纪初期中菲关系的研究”, 作者梳理了 21 世纪前 10 年中菲“黄金十年”的特点以及面临的挑战因素, 并对未来中菲关系进行了展望。

第三、对影响中菲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探讨。对于中菲两国的领土争端的特别是南海争端的研究成果非常集中。关于中菲领土领海争议的研究成果颇丰, 在此仅列举部分: “超越领土争端: 中菲关系的旧观念与新框架”^①、“菲律宾南海激进政策的缘起、发展与未来趋势”^②、“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转型”^③、“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④。还有相关研究探讨中菲关系中的华人因素^⑤, 国内政治因素对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影响^⑥, 非政府组织对菲律宾外交的影响^⑦等。

总而言之, 既有研究文献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路径, 选择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中菲关系以及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变化。已有研究要么注重历史分析, 通过历史梳理的方法来探讨中菲关系; 要么将焦点聚集于某个特定的问题

① 李开盛:《超越领土争端:中菲关系的旧观念与新框架》[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4)。

② 鞠海龙:《菲律宾南海激进政策的缘起、发展与未来趋势》[J],《南海学刊》,2016(2)。

③ 林恺铨:《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转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3)。

④ 查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J],《当代亚太》,2014(5)。

⑤ 杨静林:《中菲关系的华人因素及菲华人社会的转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⑥ 朱陆民、刘燕:《国内政治因素对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影响》[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6(5)。

⑦ 张磊:《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影响其外交的方式探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12)。

领域，如南海争端，或是关注影响中菲关系的特定因素（如华人因素）。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菲律宾国内及外行为的了解，但是这些研究都缺乏一个分析的逻辑框架，进而对菲律宾对华政策内在的因果机制进行诠释。鉴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将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综合视角，尝试构建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讨论二战以来菲律宾对华政策“善变”背后的因果机制。

三、体系压力、利益偏好、对外政策：一种新的分析 框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家族中的一个新成员全面登上国际关系理论舞台，并诞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①。冷战结束后，曾经风靡一时的结构现实主义遭遇重大的理论困境：面对相同的体系结构，为何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反应？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基于这些质疑，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必要的改进，重新将国内因素引入理论分析之中，并发展出一个分支理论。它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重新恢复了国内结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进而完善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

新古典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可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的要素结合起来解释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根据研究问题，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以解释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因果逻辑。一个完整的新古典主义模型包括体系变量和国内变量两部分，其中，体系变量是自变量，塑造但不决定国家行为；国内变量是中介变量，是体系力量的传输带。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来看，体系变量相对确定，核心是力量对比的结构特征。相比之下，研究者们引入了诸多不同的国内变量，如领导人对力量对比的认知、政府动员能力、国家的利益偏好、领导人对国家自主性的认知、行政部门的自主性、国内集团力量对比、领导人对风险和收益的认知、国家凝聚力和战略文化等^②。在借鉴了相关研究的基

^① 李魏：《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J]，《外交评论》，2009(5)，第134页。

^②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经验拓展》[J]，《当代亚太》，2015(4)，第124页。

基础上，本文建立一个调整后的新古典主义模型（如图 1），通过体系压力 and 外交决策层的利益偏好来解释菲律宾的对外政策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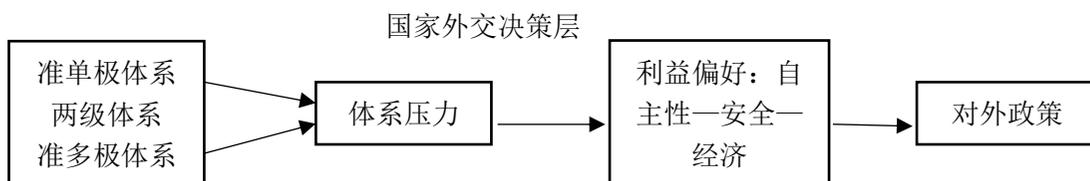


图 1 体系压力和利益偏好决定对外政策的因果机制

在本文的解释模型中，体系层次的核心变量是地区中小国家所承受的体系压力，即体系对这些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施加的压力。体系压力由地区体系在结构和进程两个维度的特征决定。按照通行的定义，结构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及其变化趋势，而进程取决于崛起国与体系其他大国（尤其是主导国）之间的互动模式^①。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同时为了分析的方便，作者把冷战以来的东亚地区体系大致分为三类：1、准单极体系，其大致时期为冷战结束后的最初 10 年（使用准单极概念是因为该时期美国是否是构成体系的单极存在争议，但当时美国的实力确实远超其他国家），此体系下，小国处于利益考量，会选择追随霸权国。2、两极体系，时间大致从 1945 年冷战结束至 1991 年苏联解体。两极体系下，两极之间激烈竞争使得中小国家很难置身事外，采取逃避或疏远的战略不太可行，必须选择含蓄或明确地支持其中一方。3、准多级体系下，大国之间的竞争呈现低强度的特点，除非对未来的事态发展和自身利益有非常明确地预期，否则中小国家没有必要选边站队。因此出于理性考量，中小国最有可能选择对冲战略。与此同时，基于新现实主义的主张，体系压力要起作用，还需要经由国内层次传导。因此，无论何种体系之下，国家具体会选择何种战略，还取决与国内层次变量的筛选，这种筛选可能加强或减缓甚至偏离体系层次的指令。

在单元层面，本文引入外交决策层的“利益偏好”这一核心概念作为中介变量。之所以引入这一概念，是出于这一考虑：菲律宾的国内政治具有特殊性，不同于很多成熟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的国内政治呈现出寡头政治的特征，国内政治活动深受不同政治家族的影响。对此有学者指出，菲

^① 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J]，《当代亚太》，2015（4），第 16 页。

律宾是一个典型的世袭寡头国家,由不同派系、不同利益的政治精英统治,而这些精英则利用混乱的官僚组织,为自身及其家族谋求特权^①。在此情况下,以总统为首的外交决策层的利益偏好便对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此,利益偏好是指一国外交决策层在几种主要外交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倾向性。具体而言,自主性、安全与经济这三种利益目标是影响中小国对外行为的主要考量。因此,利益偏好的操作化定义是“自主性—安全—经济权衡”。理想情况下,一国趋向于同时追求这三项目标。然而,对于中小国来说,在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共同制约下。这三项目标的实现方式并不同步,实现程度也不一致。因此,国家通常需要选择降低一项目标或两项目标来满足其他目标,在极端情形下,甚至需要舍弃其中一项目标。比如,两级对抗激烈,外部军事威胁严峻、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中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就需要放弃对自主性和福利的追求。

四、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具体路径

根据上文分析框架的构建及理论阐释,可以清晰地看出体系压力和国内外外交决策层的“利益偏好”是如何影响一国对外行为的,接下来将在上述分析框架的指引下,具体分析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国内因素综合作用下的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本文将二战结束以来的中菲关系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如图2)。

时间	体系特征	利益偏好	中菲关系特征
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	美苏两极激对抗	安全>经济>自主性	僵持、冰冻
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美苏两极对抗略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	安全 = 经济>自主性	解冻、建交
90年代	准单极体系	安全 = 自主性>经济	困阻重重
21世纪头十年	准多极体系	经济>自主性 = 安全	黄金十年

^① Nathan Gilbert Quimpo, “The Philippines: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rruptio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7, p.282

阿基诺三世任 内	美遏制中国崛起 态势	安全>经济>自 主性	急速倒退
-------------	---------------	---------------	------

（一）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末。亲美反共政策：中菲关系僵持的 20 年

1946 年，菲律宾第三共和国成立，首任总统罗哈斯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菲律宾独立后将献身于美国的反共事业及国际项目。罗哈斯表示：“在理解以及与存在菲美之间的同志关系中，我们能够更加安全的放心我们的命运，而不是寄希望于国际道德，后者尽管值得期望，但在今天依然还只是处于发展之中。我们很幸运拥有美国作为我们安全的保护者，在今天这样的世界上，这是对小国的屏障与支持。”^①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菲律宾拒绝予以承认。“在整个 50 年代，菲律宾对中国的政策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的简单延续。”^②与泰国等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而言，菲律宾的对华和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更为彻底而严厉。

菲律宾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外交行为选择，从结构层次看，即冷战结构下美苏两极对垒的产物。在美国的恩赐下获得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自诞生之日开始，便积极推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③。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菲律宾在国家安全上的顾虑，即菲律宾在国际上所采取的亲美反共的外交政策是与国内镇压共产党武装力量相吻合的。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亲西方，所以菲律宾理所当然的把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严重的外部威胁，另一方面，国内的共产党游击队也对国家稳定构成了威胁。

这一时期菲律宾对华政策表现为两个特点：第一，尽管菲律宾对华“隔离”政策有其国内根源，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体系层面上的冷战体制和意识形态；第二，安全是菲律宾对华政策的主要考量。这一时期，菲律宾最优先关注的是政治和安全，甚至经济问题也被认为与安全紧密相关，比如菲律宾担心华人给中国国内的侨汇会给中国带来好处，担心中国盟友的经济颠覆等等^④。中国因素始终是菲律宾外交战略考虑的重点，“中国都以某

^① H .B. Jacobini,“Main Patterns of Philippines Foreign Policy”,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23,No .4(1961),pp.513-514.

^② 黄朝瀚：《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张乃坚等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19 页。

^③ 沈红芳：《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一战后历史回顾、现状及展望》[J]，《南洋问题研究》，1989(3)，第 65 页。

^④ Purification C .Valera Quisumbing ,Beijing-Manila Detente :Major Issues-A Study

种形式主动或被动地影响着菲律宾，从而被后者视为威胁”^①。

（二）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两极对抗缓解下，中菲关系的解冻、建交、发展。

60年代末开始，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尼克松主义”标志着冷战体系在东亚地区缓和，美国实力下行，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外在约束与影响已经大不如前，这是后者的外交政策调整所要面临的外部大环境。另外，菲律宾此时面临更为紧迫的任务：发展经济。自60年代末期以来，菲律宾经济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它迫切需要与更广泛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从菲律宾的角度来看，对华缓和的经济意义尤其重要。第一，鉴于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形势，马科斯政府推出新发展外交，把经济列为最优先的考虑，因为只有经济稳定才能保证国家安全^②。第二，70年代以来爆发的能源危机，重创本已颠簸的菲律宾经济。此外，考虑到与美国特殊的经济关系即将结束，菲律宾必须寻找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和贸易伙伴之外的其他选择^③。因此到了1974年，经济需要已经成为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性因素^④。

可以说，内忧外患的集中爆发加速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石油外交”及其“友谊价格”，以及其他经济优惠活动，让一直犹豫的菲律宾政府加速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4年10月，马科斯总统声称，“菲律宾不能面对9亿人口的中国而视若无睹。无论其政府由哪种权力控制，中国都将保持其在亚洲作为一个中央强权的地位。菲律宾与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符合菲律宾的最高利益”^⑤。1975年6月，马科斯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中国签署建交公报。但是，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畏惧阻碍了马尼拉与中国建立更广泛的双边联系。

1986年，继任的阿基诺总统继承了一个经济上行将崩溃的菲律宾：经济持续负增长，债台高筑，失业人口增加，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整个经济

in *China-Ase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83, pp.41-42.

^① 代帆，金是用，《安全与发展：菲律宾对华政策研究》[J]，《南洋问题研究》，2009(3)。

^② Carlos P.Romulo, “Philippines Diplomacy Then and Now”, FTPYB Pub .Co. , 1975, p.66.

^③ Purification C .Valera Quisumbing, *Beijing-Manila Detente: Major Issues-A Study in China-Asean Relations*.

^④ Carlos P.Romulo, “Philippines Diplomacy Then and Now”, FTPYB Pub .Co. , 1975, p .66.

^⑤ 萧曦清：《中华外交关系史》[M]，台北：正中书局，1995。

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一严峻形势下，菲律宾该阶段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外交关系的重点则是有能力向其提供援助和贷款，对其进行投资，并吸收其出口商品的国家。但是在阿基诺执政时期，中菲关系却出现一系列波动。

中菲关系在阿基诺时期的倒退是一系列因素导致的。一方面是因为菲律宾政府受经济形势所迫，转向台湾求援，以求吸引更多的投资以振兴国内经济，缓解危机。另一方面，却与台湾此时的经济发展与对外政策有关。进入 80 年代之后，正是台湾经济腾飞发展之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拥有大量过剩的资金，并且在 1987 年之后台湾已正式放开对外投资，它必然要寻求对外扩展经济和贸易，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逐渐增大。作为在地理上接近的菲律宾，自然可以享受到台湾经济对外扩展带来的好处。进入 80 年代之后，正是台湾经济腾飞发展之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拥有大量过剩的资金，并且在 1987 年之后台湾已正式放开对外投资，它必然要寻求对外扩展经济和贸易，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逐渐增大。作为在地理上接近的菲律宾，自然可以享受到台湾经济对外扩展带来的好处。

菲律宾在 70 年代与中国建交，很大程度上是受实用主义的驱动，而其在 80 年代、90 年代修正对华政策，仍然是这一实用主义思想的延续，只不过台湾从外部诱惑了菲律宾^①。其次，这一政策变化也与菲律宾国内政治结构休戚相关。实际上，菲律宾国内一直存在强大的反对中菲建交的势力，但由于 1972 年戒严令的颁布，威权性质的国内政治结构使得马科斯总统可以不顾国内的反对意见而在对外政策上放开手脚。在马科斯威权统治结束，菲律宾重启民主时代之后，以前受到压制的各种声音和力量都被释放出来，政府、立法者、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商业部门、甚至外国政府都参与到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由此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反复。

（三）90 年代。冷战结束，在美国领导的准单极体系下，中菲关系困阻重重

^① Aileen San Pablo-Baviera, "Turning Predicament in to Promise :A Prospective on Philippines-China Relations", in Aileen S.P. Bavieraed .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Strategic Issues in Philippines-China Relations , Philippine- China Development Resource Center, 2000, p.23 .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一家独大,体系呈现出准单极特征。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政府做出裁减驻亚太美军的决定,布什政府决定放弃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将它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重新部署到关岛、冲绳和日本的横须贺等地。

但是,在后冷战时代,随着美国势力的撤退,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冲突的日益频繁,中国被重新定义菲律宾国家安全的威胁。在1995年年初中菲发生“美济礁危机”之后,拉莫斯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命令加强岛礁防务、海上巡逻和空中监督,并声言“需作最坏的打算、最好的期望”。1995年10月,拉莫斯总统在夏威夷的东西中心发表演说,认为中国对地区安全造成了威胁,并且呼吁美国保留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他说,“即使北京没有建立超越其边界之外的投放能力,在未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将不可避免的在政治上和军事对东亚施压”^①。对号称不结盟国家的菲律宾而言,呼吁美国的军事存在实在具有讽刺意味,但这也正折射出菲律宾在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直面相对时,其所产生的安全战略上焦虑。

埃斯特拉达政府的对华政策带有明显的延续与过渡色彩。第一,在这一时期,菲律宾对其外部安全的界定没有大的变化,中菲两国在南中国海仍然发生了一系列磨擦,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渔业纠纷有增无减,相互谴责和批评对方在南中国海上的立场和行动^②。第二,埃斯特拉达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尽管埃氏重视台湾在经济上对菲律宾的重要性,但其任内的菲台关系却日益淡化,菲律宾逐渐从其前任的“一个半中国”的立场上后退。另一方面,尽管在3年短暂的任期里外交建树不多,埃氏政府依然试图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关系。2000年5月,在埃氏访问中国期间,双方签署了《面向21世纪的双边合作的框架的联合声明》,双方均表示将致力于发展中菲长期稳定的睦邻互信合作关系。笔者认为,尽管双边关系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但联合声明仍可被视为中菲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它标示着双方关系开始摆脱以往消极的局面。

(四) 21世纪初的最初十年,中菲关系的黄金十年。

2001年10月30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① Romos: china is Asia's NO.1 threat", Tulay, Nov. 6, 1995.

^② Aileen San Pablo-Baviera, "Perception of a China Threat: A Philippine Perspective", Herbert Yee & Ian Storey edited,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Routledge Curzon, 2002, p 255.

2004年9月1日,阿罗约再次当选菲律宾总统后选定中国作为首次出访的目的地。200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建立中菲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①。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菲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各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和菲律宾两国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中菲两国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两国贸易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中菲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五)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中菲关系的全面倒退。

美国在阿基诺政府上台后,首先以经济援助作为改善美菲关系的重要手段,在2010年下半年的直接经济军事援助金额达到1.4亿美元,援助合同也达到4.34亿美元。其次以高层人员交流拉近政策共识,先后派出美国国务卿、太平洋舰队前司令长官以及多位美国智库的负责人到访菲律宾,明确表示美国将通过《军事互访协定(Visiting Force Agreement)》、提供新式军备等方式,加强美菲之间的军事合作。特别是美国宣布将菲律宾纳入其“全球合作伙伴计划”,不但可以提升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可以降低菲律宾经济对中菲经贸关系的依赖。

阿基诺政府的南海激进政策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美国在军事、安全、经济等方面的支持,以及菲律宾国内主要利益集团的持续推动,促使阿基诺政府在中菲南海争端上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强硬政策。从个人层面考虑,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个人因素是导致菲律宾采取南海激进政策的重要原因。

首先,阿基诺三世通过反腐行动打压前任阿罗约总统的政治势力,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阿罗约政府在南海政策和外交政策上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②。其次,阿基诺执政后主要的外交决策不是来源于内阁会议,而是由其亲信组成的“决策委员会”所决定。包括阿基诺本人以及其任命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等政府高官都持有相似的亲美立场。这使得阿基诺政府在决定南海政策和外交政策时,倾向于重视美国的作用和立场,而“忽视”中国的重要性^③。

^① 外交部网站:参见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9/sbgx/

^② 鞠海龙:《中华海上安全关系的突变及其原因与影响》[J],《国际安全研究》,2013,(6)。

^③ 鞠海龙:《菲律宾南海激进政策的缘起、发展与未来趋势》[J].《南海学刊》,2013(6),第61页。

五、结语

国际体系的压力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而体系的压力必须通过系统层面的中间变量起作用。对于像菲律宾这样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间地带”国家来说，国际体系层面的国家权势分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外交政策的选择。同时，考虑到菲律宾国内整体带有很强的寡头政治特征，外交决策层(尤其是总统)的利益偏好会对其外交政策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似乎是为了与前任划清界限，菲律宾的对华政策呈现出一起一落得周期性特征。由于经济状况的不乐观，经济因素是其制定外交政策时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

菲律宾作为周边国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和其发展外交关系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突然转向”，同时通过表象看本质。警惕小国利用大国的战略博弈，而双面要价，坐收“渔利”。



(责任编辑：沈钦韩)

海外游学观察

【编者按】人在高楼大厦里住久了，可能多少都会有一些返朴归真的冲动。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却又逐渐趋同的今天，能够在一处宁静安详之地停留、漫步、沉思未尝不是一种享受。在这里，我们将视野转向法国。两位作者既没有沉迷于巴黎的历史遗迹，也没有流连于法国的文化思想，他们要么是在小镇里体验安详宁静的生活，要么是在奥马哈美军公墓进行无限遐想。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辞藻，也不必依靠多么精致的描绘，让我们在平淡之中感受两位作者的真性情。

法国游记

李冰岩*

我到达的地方，是位于法国巴黎市区西部远郊的一座小镇，名字叫做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

1月14日，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们的航班于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半，迎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降落在巴黎东北方向的戴高乐机场跑道上缓缓降落。当我们领取完自己的行李，检查过关，迈步走出航站楼的时候，一位长得颇像让雷诺的法国司机已然举着名牌在等待我们了。

我们前往交换的圣日耳曼昂莱政治学院(Science Po, Saint-Germain-en-Laye)的老师，为我们安排了专车，迎接我们前往已经安排好的公寓。透过挂着层层雨水的车窗，硕大的航站楼、宽阔的跑道和起降频仍的大型客机在朦胧中逐渐消失，代之以绵延的高速公路、起伏不定的丘陵、一望无际的农田、零星散布的村落和遍布隔离墙与桥洞壁的炫目涂鸦。伴随着拉德芳斯高层建筑和埃菲尔铁塔塔尖的出现与消失，驶过小巴黎的北侧环线，我们来到了学校坐落的小镇上，来到了我们早已预定好的公寓楼。

这是一座五层小楼。淡黄色与白色的条块环绕墙壁，三角形的阳台探出楼体，颇有后现代艺术气息，一篇不大的草坪在楼下铺展，片砖铺就的

* 李冰岩，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过道在楼基和草坪之间。“让雷诺”帮我们把行李一一拿下，并把我们送进了公寓一层的一个会客大厅，随后驱车离开。不一会，房东来到，引我们进了房间，交待了注意事项，签下了租房合同。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房间以后，我们为期半年的法国之行算是正式开始了。

当你同一个中国人提及法兰西时，对方会在脑海中产生什么印象呢？是高耸的埃菲尔铁塔，还是洋溢着时尚与浪漫的香榭丽舍？是风云激荡的大革命，还是震撼人心的诺曼底登陆？是辽阔美丽的蔚蓝海岸，还是薰香宜人的普罗旺斯？是醇香绵长的葡萄酒，还是精致昂贵的法国大餐？是象鼻山那一抹氤氲的霞光，还是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还是激进的左翼运动？或许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独特的法国印象。而对于我来说，法国，或者说这个名字很长的小镇，留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安详。



在抵达法国之前，作为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我最关注的当然是安全问题。两年之内三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查理周刊》事件、巴黎系列空袭事件和尼斯恐袭事件，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印象，也让即将前往法国的我曾在内心中产生过一丝忧虑。难民问题作为欧盟国家面临的痼疾也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似乎也在媒体的渲染下成为法国人民的日常。但是，在入住的当天，房东就反复向我们强调，这里非常安全，你晚上十点走在大街上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后来，我和室友经常在晚上九点以后出去夜跑。除去大街上零星开过的几辆轿车和偶尔

几个行人之外，只有昏黄的路灯和透着灯光的窗户。在白天的时候，打开宿舍的窗户向外望去，晴天时的阳光极为充裕，洁白的云彩层层堆叠，嵌在湛蓝的天空中。不远处是一段铁路，不时有火车在高低不一的建筑物的掩映下穿行而过。再靠近楼下，则是一所幼儿园，有不少当地华人的孩子也在其中上学。每天早上十点，小朋友们准时出来“放风”，那些生机盎然的嬉闹声总能驱散各种不快。从宿舍到学校，要走过一条长长的斜坡，法国本就没有什么高大建筑，因此，晴天的时候，从斜坡放眼望去，很容易窥探小镇的一部分风貌。配合遥远干净的天空，在色彩缤纷的墙体的衬托下，总有一种油画风情。看惯了上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望无遗的蓝天白云，在徐徐的微风下，很容易撩动面向大自然的心弦。

穿过斜道，左手边步行三分钟就可以到达我正在交换的这所小小的校园，总面积可能比群贤堂前的草坪大不了多少。学校的围墙和教学楼外壁，像是用红色的不规则的石头垒成的，再用白色的石灰粘连在一起，粗犷中有一种明媚的美。校内建筑只有一幢讲学楼兼办公楼、一幢图书馆和一座餐厅。整个校园的建筑风格高度统一。楼上的塔尖和依据楼房样式制作的大型窗户的边框，让人一眼看上去如同一座小型教堂——一股浓浓的新古典主义画风。当然，里面的结构和我们熟知的教学楼还是很相似的。即使是在这么小的校园中，也秉承了欧洲人民的传统，预留一片草坪出来，摆上几张长椅和两个乒乓球台，供同学们娱乐和休息。穿过斜道向右走大概二十分钟，就会来到小镇的中心——政府机构、商业区、地铁、古迹集中的方圆两平方公里的区域。虽称不上是多么繁华，却也算车水马龙。一个首都远郊小镇的基础设施之完善，商品供给之丰富，确实彰显了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国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凡非休息日的白天，高大的邮局门前的喷泉广场上人头攒动，

遍布大街小巷的鸽子也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地段。这群飞不到三层楼高的胖鸽子，似乎很享受和人一起戏弄互动的感觉。对面是是一排格式统一的咖啡馆。几十张桌椅整齐的摆放在广场上，每到午餐和晚餐的时候，男女老幼坐在桌前，点一杯咖啡、品一份甜点，享受悠闲的休息时光。

像其他欧洲小镇一样，整个镇子的居民设施、商业设施和教育设施基本都是黄白红色调的五层以下小楼。除却水塔、镇政府和廉租房以外，这些建筑都是广为流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此同时，在镇中心有两座建筑

是不能不提的：一座城堡、一座教堂。在欧洲，城堡与教堂总是必不可少的建筑。虽然镇子上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流行不过二百年，但是这城堡和教堂，恐怕已经屹立于此四百年不止。法国文化概览课上，老师在讲解法国历史的时候介绍到，小镇北部的森林公园曾经是波旁王朝的皇家猎场，猎场前的那座城堡就是路易十四出生的地方，城堡对面的教堂里埋葬着最后一位英国专制君主詹姆斯二世。如今，这座城堡已经改作法国国家考古博物馆，而教堂，我从来没见过它看过，也没有看到有人出入，可能已经封存起来进行修缮或者仅仅是作为一处保护文物供人们参观吧。后来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座城堡在二战期间还曾经是占领法国的德军总部驻所，不过恐怕法国人都不太愿意提及这个事情吧。你认为到达的一个籍籍无名的地方实际上曾在历史上留下过不朽的印记——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当你突然发现这一点甚至发现自己的鞋底可能一不小心契合了你只曾在书本上读到过的脚印的时候，无数幅似曾相识的场景在眼前掠过，仿佛你自己穿越了时空，亲身经历了一段波澜壮阔。

最后要提的是小镇的交通也十分便利。法兰西岛地区的区域快铁在此设有一处起点站，乘此抵达巴黎市中心不过半个多小时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先贤祠等著名景点步行可达。而在地铁站附近的公交站乘公交向南，在不堵车的情况下，有半个小时即可抵达大名鼎鼎的凡尔赛宫。当然，不得不说当然要补充一下，这里的公交系统票价实在是太贵了。

、
(责任编辑：张颂)

国家的共同记忆——奥马哈美军公墓

王乃一*

来法国之前，学校让我们填了一张问卷，上面问到：“假期中你想去哪些地方？”

我填的是“诺曼底”。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到法国自然要去巴黎看夜景，体验繁华浪漫；或品尝法餐，见识一下号称能与中餐并驾齐驱的食物；又或者一头扎进大街小巷的各类博物馆，去看看人家不跳广场舞的老人到底去了哪里。

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不过在我看来，完成上述的几项任务并不困难，在巴黎待一天就能全部做到，用不着我兴师动众地去完成，毕竟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然而要去一趟交通并不便利的诺曼底，却不是初来乍到的人能随意做到的。

诺曼底是一个地区，算是挺大的一块地方，离英国不远。历史上英法这对冤家的爱恨情仇太多了，所以在诺曼底这片土地上也发生过无数精彩的故事。

而此时，诺曼底的所有历史似乎凝结成了一个点，并且成为了某东西的代名词，而这个点，就是奥马哈美军公墓。



顾名思义，我们此次旅行的目的地就是一片墓地，一片真正意义上

* 王乃一，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2015 级研究生。

的墓地——坐落于奥马哈海滩高高的断崖之上，埋葬着 9000 多名美军士兵。我对它的最早印象来自于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一片雪白的十字架敬礼。《拯救大兵瑞恩》无疑是成功的，前 30 分钟描写登陆的场景被无数亲历登陆的老兵誉为“最接近真实”的画面。而当时六七岁的我是在电影院观看此片的（在此控诉一下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这片子给我造成了多大面积的心理阴影呢？据我母亲说，开场没几分钟我便哇哇大哭，我父亲更是把他的军帽盖在了我的脸上不让我看，但是又怎么可能挡得住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惨叫声。后面发生了什么反正我也不记得了，不过之后的很长时间，我对家里《拯救大兵瑞恩》的 VCD 敬而远之。

刚刚说奥马哈美军公墓几乎成了诺曼底千年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存活在世人印象中的只有诺曼底登陆，而诺曼底登陆的最后记忆几乎是从这片公墓向世界传播开去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马哈美军公墓已经成为了一种圣地，象征着同盟国胜利的源头。

我在第二天去了圣米歇尔山，一个被称为世界第三大（基督教）朝圣地的地方。所以，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我的这趟旅程，也称得上是“朝圣之旅”。我与伙伴是在下午 4 点前到达的。进入大门后的第一个建筑是一个小型的纪念馆，门边右侧摊开了两本册子，每一位游客可以在上面签字留言。姓名、地址都没什么好看的，扫了几眼最后一栏“备注”，大部分都是“Memory”，“Honor”的字眼。

往前走是一些简单的介绍，介绍了奥马哈海滩的地理位置等信息。之后，我们就跟随着指示走下了阶梯。下楼后也是一长串的历史介绍，实物、图片、文字、影像，种类很多，介绍的是诺曼底登陆的总体情况，还算挺详细的吧，但我还是快步向前，没做过多的停留，毕竟对这段历史已经足够了解了。总体的历史回顾结束于一条短短的走廊。走廊中什么都没有，惨白的墙壁、惨白的天花板，不知哪里有音响，一个女声不停地念着阵亡美军士兵的名字，一个接着一个，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纪念他们吧。

感觉像是在叫魂，反正我走过那个走廊的时候毛骨悚然，一身的鸡皮疙瘩。穿过走廊，还是一个类似纪念大厅的地方，墙上贴着很多照片，是一些值得特别纪念的美军士兵，照片下面有他们的故事。之前是诺曼底的

总体介绍，穿过走廊就是一些特别的人和特别的事。

每个故事都能打动人，不是因为文字表达很好，恰恰相反，很多故事都是前面一大段讲这个士兵隶属于哪个单位、是哪里人、几时参军，而真正描述战斗的就一句话“Died for …”或者“He was killed …”

我在一张照片前停了很久，因为它讲述的故事就是《拯救大兵瑞恩》电影的原型。

电影讲述了瑞恩一家四兄弟中的三个在战场上阵亡，而最小的弟弟也深陷重围。为了保住这个家庭中的最后一个孩子，美国军方派出了一支小分队深入战场营救瑞恩。

历史上当然不存在瑞恩这个人，但这个故事却是有所出处的，那就是尼兰德。

尼兰德一家也有四个儿子：Robert, Preston, Eddie 和 Fritz。在短短几天当中，他们的母亲，尼兰德夫人收到了 3 个噩耗，Robert 和 Preston 在诺曼底阵亡；Eddie 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作战时失踪，凶多吉少（其实被日军俘虏，但当时并不知道）。为了避免“沙利文”¹一家的惨剧重演，美国军方根据沙利文法案决定将 Fritz 送回母亲身边。

走出了纪念馆，是一条很长的步道，步道下就是曾经尸山血海的奥马哈海滩，难以想象当时的美军士兵是凭着什么最终上岸的。尽管身后和头顶都有支援，但是真正直面炮火和子弹的却只是人的血肉之躯。

诺曼底登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登陆行动，其困难程度根本无法用文字表述：

当时很多士兵还没下登陆艇就被机枪射杀，
所有士兵都被压制在滩头上，
他们只能等死……

讲个悲伤的故事吧，解放军打国民党军在我们印象中从来都是切瓜砍菜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然而在解放军登陆金门的战役中，9000 多官兵全军覆没。连解放军打老蒋都那么难，更何况美国人打德国人了，由此

¹ 沙利文法案：也称“单独存活者政策”。沙利文一家五兄弟同在轻巡洋舰“朱诺”号上服役，1942 年，“朱诺”号被日军潜艇击沉，全舰仅 10 人生还，沙利文五兄弟全部阵亡。为避免这种惨剧再次发生，美国出台沙利文法案，规定同一家族的直系亲属不得在同一部队服役。为纪念沙利文五兄弟，美军将一艘即将下水的驱逐舰命名为沙利文号，该舰服役 22 年，退役后在海军公园陈列纪念。

可见登陆作战的复杂与艰难：

刚从水中挣扎上岸的美军士兵，
大多只有一杆步枪和一顶头盔，
他们生前用它们战斗，
死后用它们做碑。

走了几十米，左侧便是墓地所在。说实话，我确实被震撼到了，有句俗话说“兵过一万无边无沿，兵过十万扯地连天”。那么一万根十字架呢？

本来我还怕有什么忌讳，或是不礼貌，不太敢走进十字架丛中，但是发现所有的游人都在其中漫步，他们拍照、聊天，除了声音很小外，没有任何忌讳，甚至还有慢跑的周边居民！可能这真的是文化差异吧。

对那些讲美式英语的人来说，他们的家人在这里，所以这里就跟他们的家一样；对那些讲法语的人来说，他们的朋友在这里，所以这里就跟公园一样。

我走近一根十字架，因为它的面前插了一根美国国旗，仔细阅读刻在十字架上的字，却发现和其他的有些不同。

Here Rests In Honored Glory,
A Comrade In Arms,
Known But To God.

原来是一座无名之墓。

除了上帝，谁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对他来说，没有家人、不被记住、也没有人会纪念他。然而事实上，一面小小的国旗告诉了我，他并没有被忘记。

有一些墓碑并不是十字架，而是六芒星状的，代表着他是犹太人，墓地中大约安葬着 400 多名犹太人。

我记得奥马哈美军公墓中还安葬着一位军衔很高的人物，小西奥多·罗斯福，他是前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长子，也是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表弟。他当时担任美军第四步兵师的师长，在诺曼底登陆当天，他跟随第一批部队冲上了滩头。所以他的第四步兵师不仅是整个登陆部队中第一支踏上法国土地的部队，他自己也是唯一一位在那天踏上法国土地的将军。在 36 天后，他死于心脏病，与他哥哥（与一战中牺

牲)一起,葬在了奥马哈美军公墓。可惜,我没有找到他的墓碑。

身为一师之长,贵为前任总统的儿子、时任总统的表弟,能够做出随军登陆的决定,我不知道用什么话语去形容他。尽管他登陆的地点不是地狱一般的奥马哈,而是犹他。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即将面对的会是什么。我在我可怜的中国近现代史记忆中搜索,除了被放在彭德怀身边的毛岸英(毛岸英之前加入过苏联红军,不过他从伏龙芝毕业的时候已经是43年了),我想不到在中国太子一级的人物当中还有谁拥有这般勇气的。

算了,扫墓为主,莫谈国事。

继续向前,是一座很小却很高的纪念堂。堂内正中石台上刻着“I give unto them eternal life and they shall never perish”应该是出自约翰福音当中的“我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左右两侧是美、英、法、加国旗,因为这四个国家的军队直接参与了诺曼底登陆。

走出纪念堂本想继续向前,却听到身后传来三声枪响,赶紧回身,才知道每天下午四点半是公墓的降旗仪式。几个工作人员排成队列走到旗杆下,慢慢地降旗,小心地展开,仔细地叠好,再排成队列离开。整片墓地很安静,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事情。这时候就能很明显的分辨出谁是美国人谁不是。美国人都立正站好,无论是跪在十字架前的还是在和墓碑说话的。其他国家的人,比如我,就赶紧拍照。短暂的降旗仪式结束,我和伙伴也差不多走到了公墓的尽头,尽头是两尊女神的石像。一尊身上站着一只公鸡,象征着高卢鸡,代表法国;一尊身上站着一只老鹰,象征着白头鹰,代表美国;她们面向9000多美国子弟,永远守护着他们

而墓地中所有的墓碑,全部面向西方——那是美国的方向。转身回程,在公墓的开头,两根国旗杆的中间,是一个比较大的纪念堂,左右两座侧殿展示了诺曼底登陆进展和盟军欧洲战场进展的示意图。非常详细,也很直观:

同样的推进距离我在《钢铁雄心》中只用了几天,
士兵的伤亡只是数字,
而现实中却用了几个月,
尸山血海。

侧殿中间是一个大型的雕塑,雕塑下有一些花圈、鲜花和贺卡,我仔细看了看:

“We need to be thankful for the American soldiers that traveled

abroad to aid in the british victory. So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member them in away we show respect.”

落款是一所中学，应该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但从文中可以得知他们来自英国，这我不禁想起了英国和美国不同的安葬阵亡士兵的方法。

当英国士兵阵亡后，他的同伴习惯于将他就地安葬，而美国的士兵则会集中安葬。所以在诺曼底地区，有很多零散的英军士兵墓碑，但是大型的墓地只有美军的。可能这就是英国学生到美军公墓纪念的原因吧。所谓美军公墓中的英国记忆吗？

不过此时我脑中浮现了一位英国母亲在他儿子墓碑上刻下的话：“对世界来说，他是一个士兵；对我来说，他却是整个世界。”

参观活动，或是说扫墓活动算是结束了，我在回去的路上想到了我之前和法国同学的聊天，我跟他说我将要去一次诺曼底，奥马哈海滩，问他有什么建议。他跟我说每年在离美军公墓很近的巴约小镇，有一个月时间是纪念诺曼底登陆的，他建议我那时候去，到时候会有游行和狂欢。但那是在5月至6月，我并没有时间。他很遗憾，然后想了想，说：“诺曼底对于法国而言意义重大，它象征着自由。”

他跟我说的時候用了法语 *liberté*，要知道，*liberté* 是法国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中的第一个。换句话说，诺曼底登陆，让法国重获新生。这也许就是美军公墓中的法国记忆吧。

至于美国记忆，太多了。整片墓地到处都是美国元素，美国人、美国国旗、美国女神。甚至就连这块土地都是美国领土，是的，法国为了向这些美国士兵表示感谢，将这片公墓所在土地送给了美国，所以，我也算到美国转了一圈。

和我一起上课的一位美国同学是明尼苏达人，在爱尔兰上大学，也来法国交流。前几天在上课路上，聊起了假期，我说我去了奥马哈美军公

墓，他跟我说，过段时间他也会去，因为他祖父的表兄弟葬在了那里。



其实涉及到诺曼底登陆的国家远远不止四个，除去同盟国这边的几个以外，在轴心国那一边也有很多国家的士兵参与到了其中，斯拉夫人、波罗的海人、高加索人、乌克兰人，甚至还有印度人、日本人和朝鲜人，当然，对于他们来说，诺曼底远远谈不上记忆。这一片墓地安葬了9000多名美军士兵，他们只是那场战争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但是却承载了那么多国家的那么多记忆。我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长崎的原爆纪念馆，我相信在揭露残酷事实的同时，它们都承载了一个美好的希望——愿世界和平。

想了那么多，却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国家，德国。

对德国来说，诺曼底当然也意义重大，但是非常遗憾，我没能接触到德国人，也无法得知他们的看法，也许就算遇到了我也不会问——谁也不愿意被问到糟糕的记忆。不过我们可以想一想。诺曼底登陆之前，德国人在苏联战场已然节节败退，也许还在做反攻的春秋大梦，但是诺曼底登陆，彻底敲响了它的丧钟。

所以，诺曼底，还是一个帝国梦想终止的地方。

(责任编辑：张颂)

感受俄罗斯

朱信荣*

2016年7月，在学院提供的宝贵条件下，刚刚结束研究生生活第一年的我，和来自国关院以及全国其他高校的十多名同学一起，踏上前往莫斯科的旅途。此行是为参加我校国关院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系合作举办的“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而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也是难得的一次“俄罗斯体验”。

俄罗斯，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北方邻居，对于国人而言有着多方面的含义：学习国关与历史的人，会看到她由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再到现代俄罗斯所经历的充满辉煌与曲折的历史征途；对军事有兴趣的人们，则会更多地关注到这个国度漫长的军事史，及苏维埃时代军事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对文化艺术有见地的，则无法忽视俄罗斯在世界艺术殿堂享有的非凡地位；而更多只有一般了解的人们，则更多是从俄罗斯人民“战斗民族”的名声和各种有关的异闻中得知这一国度。

然而，百闻不如一见，只有真正踏足这片土地，才有机会真实感受这个国度的一切。而幸运如我，在这短短的一周交流时间内，也算是对俄罗斯这片土地建立起了更直观一些的印象。

课堂外，并未远去的苏维埃时代

苏联解体的那一年，我还未出生。长大后读到这段历史，了解到当时在这一超级大国瞬间消失的时刻，民众有着极为复杂的情感。有人希望这一刻早些到来，而有人则是更为伤感地看待这一时代的结束。此后，俄罗斯一度奋力地与西方接轨，努力想要融入到现代西方世界，此间又经历了一番转折与迷思，又决定继续探索自己的道路，而这一切已经是建立在新的国家和新的认同之上。我曾好奇过，红旗落下那一刻已过去许久，在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苏维埃时代究竟有没有真正远去？

二十多年过去，当我踏上今天这个以“俄罗斯联邦”作为正式名称的国家，来到这个国家的首都莫斯科，我所看到的景象，依然充满着并不太陌

* 朱信荣，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生的苏维埃气息。

当我们由机场驱车，一路沿公路向莫斯科市区行驶时，大量有着社会主义印记的集体住宅和公寓出现在眼前，仿佛历史重现，活生生地讲述那段时光；当我们路过无名英雄纪念碑时，那不熄灭的火炬，那些肃立的士兵都在提醒着人们，铭记苏联红军在战场上抵抗纳粹入侵的艰辛岁月；当我们漫步在红场上时，斯巴斯克塔上的那颗红星，简朴不失庄重的列宁墓和上方历任苏共领导人阅兵时驻足的检阅平台，仿佛都在自豪地展示苏维埃荣耀；甚至，当我们路过一些普通的地铁站，站厅里那些气派的“镰刀锤子”装饰和象征工人劳动精神的塑像，以至于那些老旧到行驶时发出巨大噪声的莫斯科地铁列车，也都仿佛在追忆，那个有着集体主义传统的时代。

所有这一切，也都在清晰地告诉人们，这里是俄罗斯，更是经历过苏维埃时代的俄罗斯。就连在暑期学校的多个场合，我都不断地听到“后苏联空间”这个词。对于我而言，这一词汇在学术上的使用似是不断地追溯过往，追溯那个地域辽阔、多民族共存的超级大国时代，也似乎是持续地在提醒我，苏维埃时代留下的众多遗产，并没有因为现代俄罗斯的诞生而被全面放弃。相反，随着现任总统普京一步步确立自己的执政风格，苏联时代的遗产变得愈发重要，对于重塑俄罗斯身份也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苏维埃时代，虽然从时间上逐渐远去，但在莫斯科的几日体验中，我却发现，时光的流逝，并没有使得那些沉睡在历史中的苏维埃遗存失却光辉。

课堂内，属于国际舞台的俄罗斯

俄罗斯在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从未缺席，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中，还是必不可少的“操盘手”。不过，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度使得俄罗斯这个传统大国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一度快速下滑，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俄罗斯又迅速地以地缘政治重要棋手的身份回归，重新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这些，都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然而此行我却真实直观地在课堂内外感受到了一个渴望领导地位又有着一种高傲气息的俄罗斯。

在暑期学校短暂的一周时间内，贯穿全程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课堂展示。我加入了一个以金砖国家在中俄两国媒体报道与话语的差异作为主题的小组。在时间有限的调研中，我与另一位中国同学清晰地发现，在对待

金砖国家机制和有关合作的报道中，俄罗斯媒体有着相当高的参与度，持续地关注有关议题，对比起中国国内媒体而言，更为积极；而且，在有关的研究机构的设立和支持上，也远远早于中国。在调研中我们也同时发现，俄罗斯媒体对金砖国家这一多边合作机制的认识与期待，表现得更为显著，更希望这一机制以及其中的衍生品（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能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新领军者。最后，在我们的课堂展示时，小组成员对结论的介绍中也强调了这一点。这虽然是多少有些仓促的调研活动，我却在参与的过程中，从媒体报道这个侧面，感受到俄罗斯国内对于国际领导地位与国际影响力更高、更热切的期许。或许，在俄罗斯目前面对西方国家舆论、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新的出路或许是俄罗斯当下最渴求的，而在国际舞台上寻找到一个自己有发言权也有主导可能的空间更是至关重要。

从课堂的安排上，我也发现了俄罗斯的一种对大周边的关切，其中又包含着些许高傲的气息。几日的课程，关注点基本都集中在俄罗斯参加的多边机制，最广泛的是金砖国家机制和亚太经合组织，剩余的基本都与俄罗斯的大周边有着密切关联，如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等。如上文所述，几日课程中听到的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是后苏联空间，它从地理意义上涵盖了原属苏联境内、现已独立的俄罗斯周边国家，从安全意义上而言又是俄罗斯的战略前沿。同时也听到了对俄罗斯周边战略安全的忧虑。看来，国际舞台上的俄罗斯，尽管追求一种大国地位，真正更为忧虑的，是如何保障大周边的“空间”既是战略前沿也可以成为没有后顾之忧的“大后方”。这其中，我更为直接地感受到一些焦虑，也有一些俄罗斯特有的高傲，特别是在听到老师和学生提及俄罗斯参与度和话语权的那一刻。

几日的行程，令人意犹未尽，还没有机会感受俄罗斯的高雅艺术文化，没有机会近距离在历史现场追忆俄罗斯与苏联的过往，就要启程返回。但几日在莫斯科的体验，让我真正从心灵、由学识，一步步走进这个北方邻居。宝贵的是，我既在课堂外看到并不陌生的苏维埃遗存，也在课堂内感受到一个不甘于在国际舞台碌碌无闻的当代俄罗斯，这或许是感受俄罗斯最触动灵魂之处。我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再访这片土地，细致学习、感受这个国度的精华。

（责任编辑：连鹏飞）

记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谈判和对美国的印象

冉聃*

2016年暑假，是我所度过的最充实、最难忘的暑假，因为在短短的两个月里我的足迹跨越了三个大洲、三个世界大国以及三座超级城市。无论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还是华盛顿、莫斯科、上海，对于我都是充满了故事的地方，都是让我闻之肃然起敬的符号。时隔近一年来写这篇总结，确实是太滞后了，但我觉得倒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时间一长，似乎文字里面就会少一些感性、多一些思考。



美国之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那场在马里兰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指导下进行的模拟捕鲸谈判，该谈判基于国际捕鲸委员会（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的设置，而此次谈判的主要议题是“全面禁止捕鲸（包括商业捕鲸和科学捕鲸）”。根据规则，若九个以上成员国通过提案，则提案直接生效；若只有六个成员国通过提案，则提案会在半个月后的国际捕鲸委员会全体大会上正式提起并表决，若不到六个成员国通过提案，则不形成决议。在这场谈判中，我们被要求使用线上文字交流的形式，以保

*冉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研究生。

证所有的斡旋和谈判过程有迹可循。一共有十一个成员国参与谈判，包括了支持捕鲸（俄罗斯、日本、挪威、冰岛）、反对捕鲸（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以及中立国（肯尼亚、印度、墨西哥）三个阵营。各国根据财政情况有一定的斡旋经费，军事大国及经济强国还有采取武力威胁以及经济制裁等特殊技能。谈判一开始，我们就按照阵营被分到了三个教室，我与另一位同学担任冰岛的代表，与俄罗斯、日本以及挪威的代表一同游说中立国及反对阵营的国家。首先我们分析了形势，美国是反捕鲸阵营的核心成员，而墨西哥作为美国的近邻，经济上十分依赖美国，不可能抛弃立场，因此我们放弃了游说墨西哥，而把重心放在了新西兰和肯尼亚。虽然新西兰是英联邦成员之一，但新西兰当时是由国家党执政，国家党倡导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与西欧的右转倾向存在张力，成为了可能的突破口；另一方面，肯尼亚长期处于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的袭击中，俄罗斯藉此提出愿意提供武器装备援助以及开展联合军演、派遣军官互访等承诺，日本也表示愿意加大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帮助肯尼亚人民改善生存环境。但“肯尼亚们”采取了骑墙的策略，泄露了双边谈判的内容，随后“美国”发出了经济制裁的威胁，并表示严正关切双边军事合作，认为地区安全主要的是当事国的责任，人道主义援助也要避免被扣上“选票交易”的帽子。肯尼亚则在两个阵营间挣得盆满钵满，最后倒向了美国。最终，四国支持，六国反对，“法国”因为不熟悉表决程序而“被”弃权，会议决定在全体大会上提交提案，再次讨论全面禁止“捕鲸”问题；而四个支持“科学捕鲸”的国家因为这一“粗暴的”结论，当场达成一致，决定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引得一片哗然。至此，国际捕鲸委员会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壳。

回想这场谈判，很多细节都值得回味。1、由于是采取线上交流的模式，而缺少专业的“打字员”和书记员，真实有效的信息并没有很好地呈现，各方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决策，再加上作出决定的时间紧迫，增加了各方战略误判及政策制定失当的可能性；2、各个国家都“心怀鬼胎”，捕鲸谈判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政治议题，每个反对捕鲸的国家都高风亮节，他们谴责捕鲸行为、关注人类福祉，深谙“与自然界同呼吸、共命运”的相处之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连豪揽了全场约60%斡旋经费的肯尼亚都成了“道德楷模”；3、在无政府环境下、在这个特定的情景里，每个国家都自发成为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并

且孤立地看待问题。可是美国会因为这个问题向其盟友、遏制中国同盟的尖兵——日本，施加如此大的政治压力吗？俄罗斯又是否会无视肯尼亚肯雅塔政府的亲美立场而提供武器援助呢？说到底这只是一群毫无政治经验的学生的一场“游戏”，其中几人真正理解“妥协”的艺术和技巧值得怀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确实需要一群职业政治家？



除此之外，我对美国高昂的加班费也有了直观的体会，虽然即使这样一般美国人也普遍不愿意接受接班。由于每天的交通情况不定，偶尔还会有一些突发事件，导致负责开车接送我们的马师傅常常需要在 11 个工时以外继续加班，好在马师傅是华裔，他虽然已经在美国生活了 30 余年，但对故乡人仍有着深厚的感情，于是他温和地向领队表达了不满，当然我们也因此额外支付了一大笔费用，这笔加班费大约相当于正常工时工资的一半。总的来说，马师傅帅气的墨镜、微凸的小肚腩、爽朗的笑容，当然还有客车行李箱里面冷藏柜里的冰镇可乐和雪碧，成为了美国之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有那次在新泽西的酒店门口那个小小的吸烟三角区，我结识的那一对同为烟民的夫妇，他们受邀参加一年一度的俱乐部大会，聚集了遍布世界各地的成员，酒店里面到处是他们的朋友。他俩来自北卡，友善且开朗。聊起“禁烟”话题，我不禁自嘲：属于我们的世界仅是这个尚可立锥的三角区，剩下的世界都是非烟民的。两夫妇放声大笑，热情地邀请我去北卡拜访他们，“去了北卡，要是看到有人在吸烟，那就只能是我俩了”。又是一阵哄笑。

还有在巴尔的摩市政府与市长、市议员的座谈会中，他们坦承马里兰

曾经存在的严重的安全问题，毒品、犯罪成为掣肘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及城市治理经验时，对于 Citistat 系统的设计和运作也是颇有见地，这一结合了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建设理念不仅在美国开始逐步推广，局部的借鉴在中国地方也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市长办公室和市议会将分权制衡的理念付诸实践，议会与市长办公室成为了地方治理中的两股力量，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每月一次的质询会给了各部门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调整工作目标的契机，行之有效地保证了巴尔的摩行政机构的有效运转。中央决策者为国家绘制了美丽的蓝图，地方行政人员则亲手为这幅蓝图喷绘，他们缺一不可。

可能每个到过美国的人对于美国的印象都差不多，纽约时代广场林立的摩天大厦，郊区小镇精良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城市截然不同的宁静，多民族构成及多元文化的百家争鸣，还有美国人民素质之高云云。在美国的马路上几乎看不到闯红灯，行人会严守交通规则，时常看到一些步伐矫健、商务范十足的人一边看表一边瞅信号灯，却也“按兵不动”；如果有行人想要过马路，车辆会在很远的地方停车避让，好几次即使我们伸手示意，行车依然静候，我们唯有点头致谢；餐厅里，大家很安静地用餐，偶尔会低声交谈；路边、地道偶有乞讨者，手里都会拿着一样乐器，亦或是摆弄一些其他的独门绝活，“混口饭吃”看起来更像是“挣口饭吃”。一些人可能会反驳，“外国人在中国不是依然会闯红灯、大声喧哗、钻公共政策的空子吗？”而美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正是这种莫名的感觉，好像在说：“嘿，橘子，欢迎来南边。”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不愿深究为什么外国人到了中国便开始了各种违反交通规则、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行为的原因。

时至今日，我仍不清楚应该怎样总结，才算是没有辜负一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那就这么结尾吧：华尔街上人头攒动，流连忘返的都是异乡客，他们留下的只是“到此一游”；而那些行色匆匆的赶路人，才是华尔街的主人，是世界金融的心脏。其间，同行的一学员斗志昂扬道，多年以后他会以另外一种姿态重新回到这里。姑且借某校图书馆墙上一言——“相伴皆同道，与游志无殊”赠与他吧。

（责任编辑：连鹏飞）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我院举办英文项目硕士外出考察课

为丰富英文项目硕士生的教学内容，12月6日我院组织2015级、2016级英文项目硕士班全体学生前往苏州开展为期一天的考察课。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张继业副教授为同学们主讲了“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对中国的影响”专题英文讲座。张继业副教授从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超出许多民调机构和媒体预测出发，深入分析了大国地缘政治越来越受经济因素等影响。他谈到，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可能会出现反对全球化、突显美国民族主义的特点，特朗普将更多关注国内政策，倾向减税、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反移民，而在国际上，特朗普政府将更加关注以权力为基础的和平，打击恐怖主义和反全球化，并且特朗普政府还将强调美国同盟国间的减负分则。



苏州大学钟楼前留影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对中国的影响方面，张继业副教授特别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总统任期过渡阶段面临的诸多困难、未来对华经济政策以及未来美俄关系的变化等，同时还分析了对中国的积极影响。如，为中国的区域与全球外交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为中国引领全球化和人民币全球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学们则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与张继业副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闻道

报告前，同学们在苏州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朱履骅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美丽的苏州大学校园，并顺访了拙政园。同学们感受着园林之美，惊叹于中华文化之博大。



拙政园里感受园林文化

一天的考察课，不仅让同学们聆听了其他高校学者的精彩见术，走出校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力量，更让大家获益良多。

撰稿：王玗

编辑：陆依宁

我院成功举办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三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

2016年12月8日至13日，我院成功举办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三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

本届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聚焦了苏联解体25年以来在前东方阵营内部的转型表现和多样性，一共吸引了来自俄罗斯、美国、中国等多个国家在内的17名学员参与活动。在这6天时间内，学员们紧密围绕“转型25周年”的主题，通过聆听学术讲座、集体研讨、外出参观访问、汇报研修成果等丰富多样的形式，深入比较总结了中俄转型经验，并与来自中国、俄罗斯、欧洲的资深学者及专家展开了多层次、多学科的交流 and 探讨。



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三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开幕式合影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作为致辞嘉宾于12日晚上出席闭幕式，并为每一位讲习班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撰稿：陆依宁

摄影：孙鹏飞 李迪 沈钦韩 张严峻

中外师生共迎新年 国关院举办新年联欢会

“欢乐的日子将会来临!”中、俄、美三国语言诗朗诵久久萦绕在每个人耳边。2016年12月28日晚,逸夫楼多功能厅内欢声笑语,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在这里举办新年联欢会,中外师生喜迎新年。

记载着国关院师生2016年记忆的暖场视频,拉开了晚会帷幕。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的国关学人、校园活动中热情踊跃的文化使者,视频中的一幕幕,让大家难忘。



晚会由晨辉学者李晓汀老师和俄国留学生娜斯佳用中、英、俄三种语言主持。李晓汀老师的风趣幽默、娜斯佳同学的端庄沉稳,成为晚会的点睛之笔。

两个小时的欢聚中,师生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目。研一的林森、章星星、傅裕的开场舞《失恋阵线联盟》,引爆晚会的第一个高潮。优美的吉他奏唱《奇妙能力歌》,让全场师生沉浸在有“国关陈绮贞”之称的袁铭祯的歌声魅力之中。柬埔寨留学生 Sovincla 的家乡歌曲雄浑有力,非洲小伙 Mael Eking 的独唱《Papaoute》轻松欢快,赵中野同学的《如果爱》展现了“国关男高音”的歌喉,王晓璇同学的古筝弹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将中国古典乐器的魅力展示得淋漓尽致。



贝文力老师、臧术美老师和美国学生 Tim Hughes 的中、俄、美三国语言朗诵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舒缓的音乐中徐徐展开，传递出了语言的韵律和诗歌的情意。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王小龙和伙伴表演的即兴舞蹈《两只老虎》以及尤克里里伴奏演唱《Riptide》将晚会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林森与赵中野同学合唱的《痒》彰显了两大歌手的魅力。由 TLEPBERGENOVA DARIYA 及其伙伴表演的西班牙舞蹈，热情优美。姜睿老师的女儿乔乔为大家奉上的特别节目——双簧管独奏和少林拳，则是演绎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风范。

晚会在全体学生的大合唱《爱，因为在心中》落下帷幕。欢乐的日子将会来临！2016 年留给大家不舍，2017 年带来更多的希望，因为有爱，温暖着每位师生的心。



我院举办“一带一路：中国、土耳其、欧洲与世界”学术研讨会

2017年2月14日，由我院举办的“一带一路：中国、土耳其、欧洲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理科大楼404召开。法国里昂商学院副校长 Tuğrul Atamer 教授作了题为“土耳其与一带一路”的主旨发言，我院冯绍雷老师、高晓川老师、王海燕老师、孙溯源老师和张昕老师先后做了发言。国际交流处周云轩处长和刘小燕老师，以及我院张红、臧术美等老师参加了研讨。会议由张昕老师主持。



Tuğrul Atamer 教授的主旨发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对理解土耳其本身的复杂性，表现在以下四点：其一是土耳其历史和地理上的断层（disconnection），比如1900-1923年期间，原有人口的75%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耳其的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基础；其二是土耳其作为正在崛起的7国之一（E7）与现存的强势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三是土耳其的多元性认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内部分裂（fragmental identity）的社会结构，在此提出了诸如语言、人种、宗教信仰等差异所带来文明断层线问题；其四是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学与地质学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受到东西方两个地理板块的双向挤压，其外交战略也面临同样的处境。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土耳其在“一带一路”中扮演的角色。表现在以

下三点：一是地理上的优势，其位于“一带一路”的中部走廊地带；二是作为全球经济的重心；三是处于地缘政治上和社会结构上的断层线上（seismic fault line）。发言结束后，Tuğrul Atamer 教授与参会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冯绍雷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未来国际社会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与矛盾。他提出未来国际社会将存在三类不确定性因素：一是反全球化潮流，诸如“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等事例；二是未来世界将由谁来主导的问题；三是地区性的竞争将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在特朗普上台的背景下可能存在潜在的危机。同时，他还就“一带一路”战略中可能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

随后，高晓川老师就“中东欧国家与一带一路”关系进行了发言，主要阐述了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中的政治角色、经济角色等，同时探讨了中东欧国家在中国和欧洲市场中的优势。王海燕老师就“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欧合作”进行了发言，主要指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为沿线国家提供的巨大经济发展潜力。

孙溯源老师就“一带一路与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努力”为题作了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一个平台，中国作为一个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新来者，应该积极遵循双边路径，积极与国际规

则制定国进行通力合作。

最后，张昕老师对“地理想象，空间表示和重建欧亚大陆”问题作了探讨，涉及现代的地缘政治想象、欧亚大陆的移民爆炸式增长、重塑欧亚大陆等内容。经过与会学者和同学们充分的学术探讨和交流，研讨会圆满落幕。



撰稿：臧术美、王弘毅

摄影：沈钦韩、吴景辉

编辑：陆依宁

以史观今 我院举办本学期首次知行读书会

2017年3月8日下午，我院本学期第一次知行读书会在学院阅览室举办，李晓汀老师作为点评嘉宾出席本次活动。本次读书会探讨的书目是《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同学们结合本书内容，围绕国际关系重大历史事件、当今国际热点问题，与李老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1914年6月28日早晨发生在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但针对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学界时至今日仍旧存在着激烈的争议。《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从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中，一点一滴地追本溯源，再现了在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伦敦以及贝尔格莱德这些决策中心地所发生的事情。

他最终得出结论：一战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而非一桩罪行，不能将这场灾难归咎于某个特定国家。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领导人、外交官、将军都在一战一触即发之前莽撞自负、懦弱多变，他们只是一群缺乏理性判断的“梦游者”。



“历史的魅力在于对真相的探究，也就是兼听则明”，李晓汀老师以此为开场白为同学们指出学习历史的意义所在，进而对萨拉热窝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就何为“梦游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随后，同学们从书中所提及的重要细节展开，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讨论

袁铭祯同学首先以萨拉热窝事件为例阐明民族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她认为，虽然民族主义不是导致一战的根本原因，但这仍然是一战爆发的重要因素，从而进一步强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和中日岛屿争端加剧的背景之下，加强对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因素的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把握当今中日韩三国的关系。

周婷婷同学分析了一战前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问题，及当前东北亚国际政治问题。朱启迅同学围绕费迪南大公被刺一事，分析了奥匈帝国除武力以外的可能应对手段。赵中野同学质疑一战中英国支持法国的立场，认为这有悖于“英法两国是对世仇”这一基本事实。

李晓汀老师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英法两国固然存在着世仇的负面关系，但从根本上决定英国外交抉择的还是其在欧陆的“局势战略”，他举例映证了自己的观点。虽然英俄两国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存在着剧烈的冲突，但面对德国强势的崛起会对欧陆均势造成威胁的情况下，英国最终选择支持俄国。

学院读书会希望以师生共读经典著作的常态形式，培养学生擅读书、勤思考，专注学术的习惯。读书会平均每月组织一次，邀请不同的老师参与指导。

撰稿：吴景辉

摄影：章星星

编辑：陆依宁

“时代极客·师大创造”——我院师生共同参与 师大首个校园主题日

2017年3月15日，我校成功举办首个校园主题日，本次主题日以“时代极客·师大创造”为主题，以科创为核心概念，一共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高峰论坛、六场分论坛和千个项目成果，旨在引导学校青年学生聚焦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目标，同时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要求，引领青年学子加入学术科创实践行列。我院教师贝文力、余南平老师，俄罗斯留学生 Marina 应邀参与相关活动。

15日上午，贝文力老师在理科大楼404会议室进行“转型时代俄罗斯文化形象”演讲，提出社会结构的转换、机制的转轨、利益的调整及观念的转变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他从公元八世纪皈依基督教到1917年俄罗十月革命，从苏联解体时颠覆性的转型到普京时代建设性的重构，为大家系统地讲解了俄罗斯历史上重大的社会、文化转型。

15日下午，俄罗斯留学生 Marina 出席“转型时代的文化形象”分论坛，在“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环节中，Marina 与主持人和观众分享她对中国认识的变化，她认为，中国正从一个缺乏创造力的国家向科技创新能力逐渐增强的全球性负责任大国转变。



闭幕式暨“奇点临近——大变动时代的思想、技术和我们的未来”高峰论坛在体育馆进行，大咖云集，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多个主题进行演讲。纽约大学 Adam Branden burger 教授，中科院院士褚君浩，设计学院院长魏劭农教授、脑功能基因组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林龙年教授等围绕“创造与创新”、“迈向智能时代”以及“科技时代的人文设计”、“解码大脑”的主题，分别进行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在此期间，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余南平教授进行了主题为“我们的时代与选择”的专题演讲，指出当今时代同时具备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矛盾交织和科技发展步伐加快的特征，进而为同学们指出未来的机遇与选择，包括大国成长红利的机遇、新学习范式和新价值观的培养等，在演讲的最后，余老师给予全场同学以激励。

通过举办校园主题日，华师大开创全国高校之先河。在本学期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华东师大还将迎来“阅读”和“艺术”两大校园主题日，国关院也将继续结合校园主题日推陈出新，与学校一同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搭建新平台、开创新模式！

撰稿：吴景辉

摄影：吴景辉

编辑：陆依宁

刘文飞教授在我院做“苏联解体后俄语文学的若干悖论走向”主题讲座

3月22日下午，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做客我院，做了以“苏联解体后俄语文学的若干悖论走向”为主题的演讲。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俄语爱好者俱乐部等的师生代表共50余人聆听了讲座。



刘文飞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的俄语文学已经走过26个年头，它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充满跌宕和起伏，伴随惊喜和失落，呈现出的若干悖论更引人注目。刘教授总结了四项悖论，一是俄语文学的非意识系统化和新意识形态的迅速生成，二是后现代文学的兴起和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三是文学中心主义的消解和国家文学意志的建立，四是侨民文学的终结和当下俄语文学世界图景的碎片化。诸如此类的悖论既相互抱合又彼此转换，体现着当代俄语文学的独特境况和复杂构成。讲座结束后，刘教授与在座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解答了师生们的提问。

刘文飞教授任职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利哈乔夫院士奖、“阅读俄罗斯”翻译奖、“莱蒙托夫奖”、俄联邦友谊勋章获得者。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俄语诗史》、《阅读普希金》、《布罗茨基传》等十余部，主要译著有《普希金诗选》、《俄罗斯文化史》、《俄国文学史》、《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悲伤与理智》等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撰稿：张严峻

摄影：冯燕



《闻道》征稿启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管，是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我们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学人与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征稿栏目主要有国际问题研究、学术随笔（含书评）以及文艺专栏等。国际问题研究主要刊登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来稿字数在10000字左右为宜。学术思想随笔（含书评）主要刊登古今中西经典著作阅读、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文章，3000-6000字为宜。文艺专栏主要刊登文化艺术类题材随笔，如文学、电影、音乐、戏曲、旅游、时尚等，2000-5000字为宜。

来稿时敬请作者注意：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本刊属于内部发行，不影响投稿之后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
2. 来稿需为word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可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注释体例。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3. 投稿作者同时需要提供200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通信地址、电话等），以便于后期邮寄期刊和支付稿酬。
4. 本刊对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实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评审意见会以电子邮件发送给作者。我们会在2个月之内给来稿作者以回复。
5. 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本刊对决定刊登的稿件可作必要的修改，不同意修改者，请在来稿时注明。

6.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wendao_ecnu@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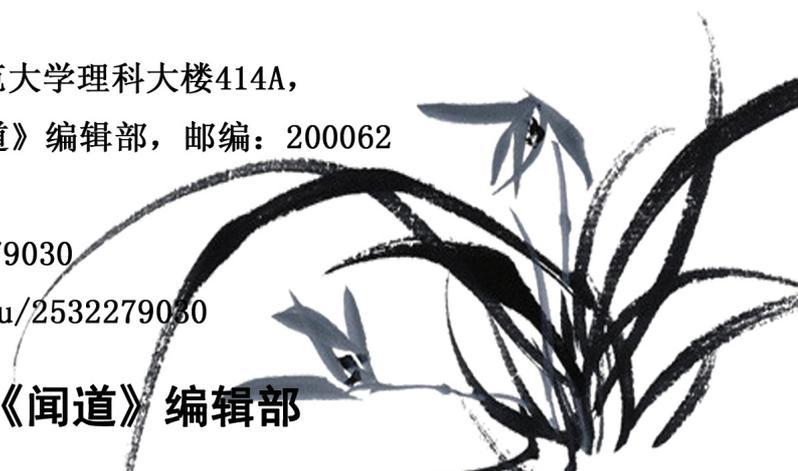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414A，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闻道》编辑部，邮编：200062

网站：<http://www.saias.ecnu.edu.cn>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532279030>

新浪微博：闻道杂志社，<http://weibo.com/u/2532279030>



《闻道》编辑部



S A I A S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